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 SU TONG ZHAN
LI LUN YAN JIU

2024年
第**2**期
总第72期

准印证号（甘）LK6200056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SUTONGZHANLILUNYANJIU

2024年第2期(总第72期)

封面题字：何鲁鹿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目 录

主管单位: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编委会成员

主 任: 孙雪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真 王亚莉

石岱千 刘仲奎

李晓霞 张耀宇

杜怀明 尚勋武

苟天宏 郁川虎

赵金云 赵凌云

郭天康 姬安岳

秦 禾 秦忙龙

敏隆邦 葛建团

蒲晓贞 霍卫平

统战理论新思维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人民性

——基于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比较等四则 (4)

本期特稿

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把握好三对关系

——对 Q 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的思考 郭伦德(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认识“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 刘良军 黄月慧(17)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和显著优势 李承儒(23)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西部地区 T 县为例 李晓蓓 李玲珑(31)

发挥统一战线作用 推动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 王 昊(37)

中华文化研究

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的“大一统”理念 王雄刚(42)

2024年第2期(总第72期)

2024年6月20日

民族宗教理论与实践

-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孙正林(52)
- 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 王怀诗(59)
- 民族团结教育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研究探析 程红瑜 石磊(63)

2023年全省统战理论研究成果专辑

- 关于政党协商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思考 定西市委统战部(67)
- 做好党外人才工作的对策建议——以陇南市为例
..... 陇南市委统战部(71)
-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参政党的新角色和新使命
..... 天水市委统战部(74)
- 甘肃省对台经贸交流合作现状及对策建议 甘肃省委台办(76)

资政建言

- 我省要持续拧紧电动自行车“安全阀” 赋能民生幸福 张玉燕(80)

主 编:王亚莉
 编辑部主任:蒲富平
 编辑部副主任:王 昊
 本期执行编辑:王 昊
 责任编辑:王 昊
 张凤玲
 卢婉春
 闫丽红
 马 霞
 常海哲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安宁西路 818 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634058
 0931-7783804
 传真:0931-7783804
 电子邮箱:
 GSTZLLYJ@126.com
 印 刷:
 甘肃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统战理论新思维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俊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发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人民性——基于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比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人民性内生于中国理论与实践、制度与组织、文化与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石,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这里的人民性不简单强调整体利益的绝对性,而是以人民为中心,有效协调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作者强调:中西方文化都表达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但二者对人的属性,以及人与宇宙、国家、他人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又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而存在的,具有“共同体”的概念和意义,而西方文化中的“人”则是一个个体性的概念。中西方文化在和谐与对立、合作与竞争、共同体与个体、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五对关系的差异性认知,体现在协商民主上,集中表现为西方协商民主强调个体权利的至上性;而中国协商民主既不简单强调整体利益的神圣性,也不简单强调整体利益的绝对性,而是有效地协调个体的个人利益与人民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编辑崔海教在《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发文《新时代统一战线践行团结奋斗的路向选择》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全党工作的重要主题。深入研究领悟团结奋斗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并具体践行,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责任与使命。

激发内在自觉是团结奋斗的坚实基础。团结奋斗的基础是团结,没有团结则无力奋斗;团结的基础是同心,没有同心的团结是没有基础的团结。团结奋斗首先要解决人心问题。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大力弘扬团结奋斗的主题,就要凝聚团结奋斗的内在共识,激发团结奋斗的内在自觉,以内化于心激发外化于行。要从理论学习激发内在自觉、传统文化滋养内在自觉、研读历史体悟内在自觉、立足现实强化内在自觉四个方面激发内在自觉作为团结奋斗的坚实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注重团结奋斗。几千年来,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朴素道理到“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的金玉良言,从“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观念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统一始终被视为中华民族“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和合文化源远流长,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和为贵”的道德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到今天的“和谐社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源于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合文化不但是中华文明处理不同文化、宗教、地域、国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文化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连续性文化实践。和合文化的根本是引领团结。

西南民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刘利在2024年第5期《求知》发文《着力提升新时代统一战线网络舆论引导力》提出: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的平等性、虚拟性、交互性、便捷性、及时性、开放性传播特性使得新时代网络舆论较传统社会更加分散多元,对凝聚新时代社会共识和巩固思想政治基础产生了冲击,而统一战线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人力优势和功能优势,在提

升新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要积极搭建多元化平台。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和新兴媒体传播的双向性、互动性以及网络参与主体身份与话题讨论的开放性、参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网络参与的即时性等特点,加快搭建网络参政问政平台、网络舆论引导平台、统战网络工作平台等,通过开展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监督,全面开展网络协商、网络教育引导,深入分析社情民意,帮助统战部门更好地掌握新时代网络舆论规律,更准确把脉网络舆论走势,更有效控制网络舆论扩散,及时堵塞虚假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和遏制网络负面舆论的发酵、传播,为健康正向引导网络舆论畅通渠道。

二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着力抓好网络舆论。同心圆强化对新时代网络“意见领袖”的思想政治引领。首先注意深入调研,准确把握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特征,充分认识其在统一战线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共识宣传,将他们的合理诉求纳入制度化轨道,确保其网络舆论与党的路线、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其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统筹用好网络宣传平台,创作大量优秀作品,记录伟大时代,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最大限度释放网络“红人”和自媒体社会正效应,在网络舆论正向引导上形成强大合力。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瑜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撰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逻辑、理路遵循、践行方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论述,分别对应破除传统文化虚无主义、革命文化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虚无主义三大症候,构成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的文化逻辑,引领并指导其理路遵循,为践行方式提供解析路径。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将指引我们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文化变

局新时代意识形态形势发生全局性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环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是强化国家意识形态自觉、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举措。

将秉承“两个结合”作为文化建构的方法遵循,从文化建构上否定文化虚无主义的“合规性”。“两个结合”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将“两个结合”作为文化建构的方法,可从方法层面解构文化虚无主义的传播可能。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是最具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的文化表达形式之一,中华民族独有的五千年文化积淀为讲好文化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深邃的价值意蕴、不竭的创新动能。文化虚无主义通过苛求中华文化的历史局限、歪曲中华文明的集体意志、抹黑中华民族的历史英雄来消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秉承“两个结合”作为文化建构的方法遵循,从文化建构上否定文化虚无主义的“合规性”,需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弘扬彰显革命文化铮铮风骨的英雄史诗,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模范事迹,涤历史之原貌,扬文化之精义,筑文明之根基,将“两个结合”贯穿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之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这种契合是历史思维与现实逻辑的有机融通,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推向新的高度”。将秉持“两个结合”作为文化建构的方法遵循,需在“第一个结合”中,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进程、现实路径、未来图景,从历史、理论、实践的文化维度建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需在“第二个结合”中,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蕴、当代价值、未来潜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文化动能与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王昊

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把握好三对关系

——对Q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的思考

郭伦德

【摘要】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从服务于首要任务,还是走出“过剩——内卷——过剩”发展困境,我国企业必须从数量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提升型增长全面转型。完成这样一个转型是一场深刻变革,企业必须正确处理练内功与练外功、大与强、企业成长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树立科学的投资观、用人观,真正把着力点放在注重练好内功上,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质的有效提升中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关键词】专精特新 练内功 一流企业 企业家精神 实际有效工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宏观上讲,推进高质量发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是顺应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外部环境“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的现实选择。从微观上讲,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企业摆脱行业“过剩——内卷——过剩”增长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瞄准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目标勇攀高峰的必然要求。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笔者2023年对Q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Q市食品”)进行了典型调查。基于这次调查并参考其他方面的案例和数据,笔者认为从传统数量扩张型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企业不

亚于一场革命,能否在未来各种不确定性下成功走出一条企业特有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难以预判,成功没有确定的模型可以遵循,有时甚至需要一点运气。但在所有不确定性中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正确处理以下三对关系是企业成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一、正确把握内功与外功之间的关系,毫不动摇地把练好内功作为立企之基

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劝告民营企业家,“要练好企业内功,特别是要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存在的根据,外因是存在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正确把握内功和外功之间的关系,始终把练好企业内功作为强企之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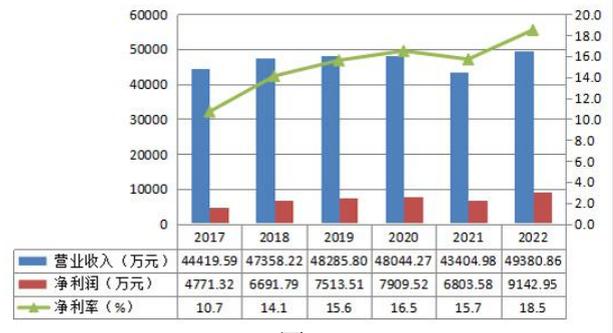
就企业经营来讲,成功既来自内部高效的管理,也来自外部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的国家扶持政策,各种内外条件对企业成功的贡献很难算清楚。虽然管理学教材告诫所有企业管理者,成功一定来自有效地管理。但现实经营中,靠运气、靠胆大敢干、靠

作者简介:郭伦德,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教研部教授。

投机取巧、靠模仿抄袭、靠“特殊”政商关系、靠用“钱”堆,许多民营企业没有特别强大的内功也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以至于现在仍然有不少企业经营者嘴上讲练内功重要,行动中却没有当回事,坚信只要站对位置“风口”猪都能飞起来。不少企业经营者沉迷于寻找外力,把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花在练外功上,梦想“运来天地同借力”“天上掉馅饼”“一口吃成胖子”。

实事求是地讲,内功练得好,企业经营不一定成功,但相对于那些不注重练内功的企业来说,遇到外部冲击时,更有能力把冲击的影响消减得小一些。比如,在三年疫情中,我国许多企业业绩受到较大冲击,其中不少企业业绩到2023年还没有恢复过来。但笔者对Q市食品的调研发现:公司业绩虽然也受到了疫情冲击,2021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比2019年减少4880.82万元和709.93万元,但不仅净利率保持稳定(从15.6%上升到15.7%),而且2022年业绩已经回升到超过疫情水平(见图1)。纵向比较2017年到2022年的经营业绩,Q市食品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总体呈现稳定的上升走势,经营绩效(以净利率衡量)不断提高。上述数据,一方面表明Q市食品企业内功练得好,另一方面也说明好的内功能够提高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2019年5月16日,美国把我国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开始以非市场化手段全方位打压华为。三年来遭受美国如此强度地针对性打压,2022年华为营收仍高达6423亿元,净利润达到356亿元。虽然营收和净利比打压前的2018年分别下降789亿元和237亿元,^[3]但华为挺过来了,且完成了13000颗器件的进口替代开发、4000块电路板的反替换板开发^[4]、14nm以上EDA软硬件开发78款工具国产化替代^[5],突破“乌江天险”实现战略突围。这与华为公司持之以恒地在技术创新上练内功分不开。近十年,华为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超过9773亿元。目前华为是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12万件。2022年,华为再次凭借768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企业榜首。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为员工总数为20.7万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为55.4%。

图1: 2017-2022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业绩



(图1)

企业内功练得好,在宏观经济下行周期中,穿越周期的能力更强。以当前房地产业为例,近三年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市值从最高1500亿港元跌到目前约80亿,跌去了95%;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市值从最高近400亿港元跌到目前约30亿,跌去了90%多;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已经停牌,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香港高等法院判清盘,连公认的地产“优等生”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出现流动性风险。就在国内地产业一片风声鹤唳的时候,也有少数地产企业逆势上涨。2023年,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合同销售金额1400多亿元,上涨13.6%(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16622亿元,下降6.5%,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6.0%);营业收入达到802亿元,上涨10%。近三年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市值从最高400多亿港元跌到目前约150亿,只跌去了60%多。分析越秀地产抗周期之力,应归功于企业对融资成本的管控能力,2023年加权贷款融资成本仅为3.82%(很多地产公司加权贷款融资成本在10%,甚至20%以上)。^[6]相较于其他同行,显然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穿越中国地产业所谓第三轮周期^[7]的底气和信心更足一些。

注重练内功的企业,有时确实会丧失一些“冒险式机遇”,在“破坏式创新”来临时甚至行动迟缓。正如诺基亚最后一任总裁在公司被收购时所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错,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8]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确实带来了比过去更多的颠覆现行企业的破坏机会,但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迭代式微创新才是常态。如果说“破坏式创新”是质变,那么迭代式微创新就是量变。没有量

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质的更迭。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要有量的积累,才会发生“天才的灵光一现”。且正如天才发现降临时机纯属偶然一样,人们无法事前准确预测“冒险式机遇”和“破坏性创新”什么时候出现。就像人不能因为不知何时降临的小概率的坠机事件而放弃乘坐航班一样,企业不能被动地等待它们的出现,更合乎理性的是持续练内功,通过量的积累推动企业不断地发生迭代式微创新,这才是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之道。

如何才能练好企业内功?内功不是无源之水,练好企业内功也是需要花钱的。致力于练好企业内功必须建立更加注重向内投资的企业投资制度。企业投资有两个方向,一是对企业外的投资。即凡向外扩张,钱花在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业务经营范围上。二是向企业内的投资,比如加速设备折旧、对现行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引进或研发一种更先进的技术、数字化改造、推行一种效率更高的管理模式、加大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训练等。简言之,加强基础以练好内功,在这上面增加的开支就是向企业内的投资。要树立向外投资以向内投资为基础的投资原则,确立向内投资高于向外投资的决策地位。建立相应的投资财务制度,在安排企业投资预算时,同步安排和优先保障用于向内投资的资金。要建立有约束力的向内投资资金保障制度,以公司章程的形式规定企业营收或利润用于向内投资的比例,持续扩大企业向内投资的投资额度。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经验启示我们,企业向内投资要始终把职工人力资本投资放在第一位。^[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0]人才是科技进步与推动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对企业来说,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是攀登科技树和获得创新红利的前提和支撑条件。致力于练好内功的企业,要建立面向所有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制度,始终注重不断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和劳动能力。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立企之基在于一代又一代职工累积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企业竞争力长盛不衰的秘诀在于企业舍得在员工培训方面花钱。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笃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信念,练内

功必须把着力点和中心点放在激发职工主人翁精神上,创造更多条件更好发挥企业职工的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调研发现,在Q市食品,一家两代人在公司工作不是新鲜事,今天仍有许多职工的孩子在大学毕业优先选择向公司投简历。自1950年创办以来,Q市食品始终把职工看成企业最富贵的财富,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发展企业,各个历史时期都出台了相对健全的员工培训和职业提升制度。2021年公司改制主板上市,公司治理体系虽然与国营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以内部培养起来的“老职工”仲明为董事长的新一届董事会,成功打造出了一套“两个结合”现代企业治理体系,既结合国企老传统又结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发展企业的Q市食品治理之路。笔者认为,这是Q市食品职工及其子女信任公司的原因,可能也是Q市食品稳健走过73年岁月基业长青的“秘诀”。

二、正确处理“大”与“强”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202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11]2023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12]从微观上讲,企业发展不仅体现在营业收入、生产规模、资产规模等数量指标的扩张上,也体现在经营效(益)率、市场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创新活动指数等质量指标的提升上。转向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处理好“大”和“强”的关系,既要做大,实现数量指标上的持续增长,更要做强实现质量指标上的持续提升,始终坚持把质的有效提升放在第一位。

管理学研究发现,从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来看,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两者可以是一个相互依托和相互作用促进共同提高的过程;也存在一定的背离关系,过于追求量的扩张可能会忽略或影响质的提升,进而为后续量的扩张埋下安全隐患。杨杜研究发现,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容易掉

进两大陷阱：一是冒进陷阱。一般在企业创立7~8年的时候出现。创业成功，导致企业主盲目自信，进而多元投资，企业规模快速膨胀，最终引发管理失控，企业破产倒闭。二是保守陷阱。一般出现在企业创立20年左右的时候。^[13]这时，企业成长往往已经进入了饱和期，迫切需要二次创业。但由于组织的习惯性力量过于强大，导致企业面对变革过于谨慎，行动迟缓最终使企业失去了再造重生机会，陷入成长停滞状态。落入上述两种陷阱正是质与量相互背离的结果。要避免落入两种陷阱，企业必须走坚持做优做强为先、坚决摒弃贪大求全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从现实发展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大的不少、强的不多的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榜单的数量不断增多。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共有135家企业上榜，加上台湾则有143家企业上榜。^[14]国内也搞了中国企业500强、民营企业500强等类似榜单，入围门槛年年提高。不加分析地看待这些数据，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企业越来越强。但如果深入分析下去，就会发现上榜企业多数是大而不强。据刘俏计算，在美国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所有企业(金融企业和公用事业企业除外)，1963—2001年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为11.6%，而1998—2017年在中国A股上市的企业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不到4%，即单位资本投资的税后利润中国股市企业不到美国股市企业的一半。^[15]来自其他方面的数据也得出同样结论。2018年，中国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包括东风、一汽、广汽、吉利等加起来，利润总额是137亿美元。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一家企业，当年利润额达到250亿美元。中国这么多的车企加起来的利润，只是丰田一家公司的大约一半，而我们的规模和员工数要远远超过丰田，人均利润额差了将近5倍。^[16]在刘俏看来，“大”企业与“伟大”企业有显著区别，后者至少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保持比竞争对手、比资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资资本收益率。^[17]根据这一定义，目前中国大企业当得起“大”的不少，但当得上“伟大”的却很少。

要实现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升级，必须

推动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国际经验表明，在当代从大到强要去多元化，走专业化经营之路。调查发现一些企业之所以热衷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有的是市值管理的需要，有的是为了分散经营风险，有的是为了安全、迷信“大而不倒”。也有的纯粹是为了大而大，因为大企业更受政府和社会追捧，开会可以坐在前排，推荐政治安排、商会会长人选更受组织关注，融资、上市更受照顾，招聘人才投简历的更多。也有的是什么都想要，多元化经营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抓住尽可能多的发展商机，而商机是最稀缺的资源，一旦错过悔恨终生。总之，企业有一万种理由做大。但大的未必是强的。刘俏研究发现，在股票市场上多元化经营企业往往相较于专业化经营企业会有一个估值折价。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多元化经营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导致资本收益率下降。大型金融集团，确实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但社会对其评价负面，这些集团往往与垄断、经营不透明、代理问题、高管薪酬过高等联系在一起，饱受公众批评。^[18]无论是2008年从美国开始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最近发生的美国前十大银行硅谷银行破产事件，无不表明只要企业大而不强，那么不管多么大都不能避免不倒(或被政府接管)的命运。非金融企业，由于引发国民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倒就真倒了，政府可能不会接管，一般也没办法接管。过去四十多年多起大型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破产倒闭的历史，早就揭示了这个听起来有些残酷的事实。当然，我们也看到，当今社会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多元化经营也有一些企业在做大的同时做优做强了。比如通用电气和谷歌。这些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不仅没有遭遇估值“折价”，反而提升了估值溢价，经营方式与过去庞大僵硬的企业帝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书写了各自成就伟大企业的创业故事。这些企业是如何做到的？一是领导者卓越，要么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如杰克·韦尔奇；要么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如拉里·佩奇。二是时势造英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兴起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先发数字企业能够利用先快一步的优势占据庞大流量数据筑牢竞争“护城河”。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未必强的传统商业逻辑，但我们认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最终仍会起作用,改变的不过是发生作用的时间和形态。考虑到上述成就伟大企业的两个关键因素都很少见,刘俏研究认为,对于普通企业而言,虽然管理良好的多元化经营也能够避免估值折价,但坚持专业化经营可能才是更可行、更保险的选择。^[19]美国学者 Franko 研究发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主要工业国家的大型企业都出现了去多元化的管理趋势。在他所选取的 200 多家美国大型制造企业样本中,1980—2000 年期间采取集团化经营的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占比不到 5%,而采取集中化经营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这一趋势在欧洲和日本同样如此。^[20]中国企业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截至 2024 年 3 月底,我国累计五批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2.4 万家,其中“小巨人”企业 1.2 万家;名优特新个体工商户 16 万家。^[21]与我国现有 5200 多万家企业和超过 1.1 亿户个体工商户的总体数量相比,^[22]“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还太少。2022 年 2 月 28 日,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始终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退出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围绕所在领域深耕细作,不沉溺于机会主义和规模速度情结,不随意跟风频繁转换赛道,坚持以专业化做精做优,打造细分领域核心优势。2023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时指出,“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23]

具体说来,中小企业要以成为某个细分市场的行业小巨人或领导者为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后要继续向成为这个细分领域全球“隐形冠军”的“城墙口”冲锋,久久为功,决不放弃。从调查来看,Q 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自 1950 年创办以来一直坚守在食品生产领域,现已拥有先进食品生产线 22 条,生产饼干、面食品、花生制品、红小豆制品、巧克力糖果、调配米粉、休闲食品、奶粉等 7 个产品系列共计 100 多个品类食品。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来,仍然坚守在食品领域,未利用上市融得的资金搞多元化经营,更没有跟风进入

互联网、房地产、新能源汽车等新赛道。上市融得的资金,按融资计划专心致志地用于山东省外 8 个产品营销中心搭建、国家级食品研发中心建设和新产品研发、生产线和仓库智能化自动化升级、专家公寓建设。公司坚持把每一分钱用在练内功上的老国企理财传统,按建设进度暂时闲置的资金,只用在稳健收益类理财上,既未用来改善公司办公“楼堂馆所”,也未在接待费上“奢华铺张”。调查所见,高管办公场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建的老楼房,接待用餐“四菜一汤”,唯一看起来比较气派的场馆是产品展示大厅。以内生发展为主线,以外延发展为两翼,通过开拓创新打造百年青食。我们认为这种朴实稳健的专业化经营作风,是 Q 市食品公司业绩穿越疫情周期保持稳定、各项财务指标保持健康、持续以高额收益回报投资人(2020 至 2022 年三年累计向股东现金分红 1 亿元以上)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看到作为一家国资控股国内主板上市企业,在国内饼干细分市场领域,Q 市食品公司与主要竞争对手民资控股香港主板上市的广东嘉士利集团有限公司比较,在饼干产品线的宽和深两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后者目前开发的饼干产品线的宽度有 8 大系列共计 225 种品种,其中最深的一系拥有 49 个饼干品种,最浅的一系也拥有 9 个产品型号。目前国内饼干这个焙烤食品细分市场,市场主体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截至 2022 年底,营收超过 2000 万元的规模企业仍有 608 家),市场竞争比较充分。这个行情,加上较好的内功基础,Q 市食品和嘉士利都具备成长为饼干细分领域行业小巨人的内外条件。像 Q 市食品、嘉士利这样的企业,在中小企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从小而优成长为大而强。我们认为,在指导方针上要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24]“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不停步、能快则快,争取最好结果。”^[25]在产品策略上,要进一步聚焦主业主品,把更多资源集中于销售增长最快、投资回报率最高、对消费者的黏性最强的产品线和产品型号,同时持续推进新品潮品研发,适应地域化、多样化、多层次性的消费需求,在绿色化、健康化、高端化上精耕细作。在竞争策略上,要主动作为,逐步提升整合全行业产品链的能力。建

议从深化纵向一体化合作做起,搭建从原料生产到产品营销“最后一公里”的全产业链企业协作体系;同时,也要积极推进横向一体化合作,形成各竞争企业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格局;在提高全产业链的深度、长度、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整体价值和国际竞争力上发挥领军企业应有的作用,推进我国现代化食品工业体系建设,为成长为行业小巨人构建良好行业生态。

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也不能盲目多元化。一是要回归主业。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经过三年锻造,一批重大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成功实施。到2022年底,中央企业从事主业的户数占比达到93%,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营业收入占比超过70%。应该说,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回归主业主责的任务基本完成。二是要坚守主业。主业大而不强,投资收益率低是许多非金融类国有大型企业转向房地产、金融业、文化产业等领域的重要原因。推动国有大型企业坚守主业,必须做强主业。三年改革大行动,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2021年比2020年分别增长18.7%、26.3%;其中,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2022年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三年行动之初增长32.5%。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主业经营绩效实现了大幅提高。在经营绩效改善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与2019年相比,2021年209户“科改示范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6.5个百分点,新增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增长69.5%。2022年底,中央企业研发投入经费超1万亿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26]我们认为,绩效的改善和研发强度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国有大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他们坚守主业提供了物质条件。三是要勇于揭榜挂帅当“链长”,在打造先进产业集群中发挥“国家队”作用。三年行动期间,国资委分两批遴选16家“链长”企业,在提高我国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的产业链韧性和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性上发挥了“国家队”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制造业增强内生动力。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分工深化和集聚发

展的高级形式,集群内大中小企业之间紧密互动,通过产品和服务结成富有韧性的生产网络,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集群内各类创新主体大量集聚,便于开展多主体协同创新,起到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加速技术外溢、加快成果转化的作用。2022年11月,工信部正式公布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名单。数据显示,45个国家级集群2021年主导产业产值达19万亿元,布局建设了18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占全部国家级创新中心数量的70%),拥有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1700余家,培育创建了170余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22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7]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2023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要求把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国有大型企业在先进产业集群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继续通过突出主业、做强主业强化“国家队”和产业链“链长”的引领作用。四是要锻造始终立于市场竞争不败之地的“杀手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各国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国有大型企业做强主业要在锻造自己独有的“杀手锏”上集中着力。有了自己的“撒手锏”,就不怕被外国“卡脖子”,在面临对方断链脱钩威胁时就有更大的底气,因为我们可以实施同等报复。锻造“撒手锏”,国有大型企业必须增强为行业或领域解决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系统软件和基础性工具软件等“卡脖子”问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解决进口“卡脖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坡过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正确认识企业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矢志不渝地践行优秀企业家精神

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家,才能创办出世界一流的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8]打赢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场革命性战役,必须高度重视企业经营这个“关键少数”人的主体性作用,不能见物不见人。调查发现,许多企业经营者在当年创业时身上都有一股敢拼敢干的“劲”;当事业成长到现在的规模,需要“二次创业”时,这些人中的很多人精神上

的这股“劲”没了。这是一些企业经营者在面对“不转型等死、转型可能找死”两难困境时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创新就是转型,转型就是创新,创新就要敢于消灭自己。要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给企业经营者在精神上“补钙”,坚定他们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自我革命勇气和自我斗争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高度重视企业家精神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意义。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来自企业家精神。”^[29]2017年4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29]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论述指导下,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不同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有且应当有所不同。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转型发展,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流企业家标准(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社会责任、胸怀世界)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开展,做到“五个结合”:

第一,要把大力弘扬爱国情怀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我国真正市场化生产的企业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自从企业产生的那天开始,我国企业家就把爱国写在自己的奋斗旗帜上,诞生了弦高救国等爱国故事。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

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30]1870年、特别是1900年以后,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理想,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民间创业潮。在那样一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们创业之艰,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资金、人才、技术甚至原材料都极端缺乏,货币权、定价权、贸易权、海关权等经济主权操于洋行之手,时刻面临国外资本不惜动用武力的欺凌式竞争,官吏与民众愚昧不明、排斥甚至抵制现代技术,国内战乱不休,个人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为中国兴办起了一批近代工业,为中华民族不至于亡国灭种保留了一丝元气。今天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困难是有的,但困难肯定大不过清末民国办企业搞经营。如果有为国办企业的爱国情怀,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克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并指出当代企业家的爱国形式“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31]因此,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把大力弘扬我国企业家爱国光荣传统和建设一流企业目标结合起来,引导企业经营者把爱国行动落实到为国争光办好企业的具体实践中,不断砥砺坚定不移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意志品质。

第二,把大力弘扬勇于创新精神与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践行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结合起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就要敢于承担风险。敢为天下先是战胜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3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今天转向高质量发展进行二次创业,必须大力弘扬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其一,这是战胜当前国内面临三重市场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和国外面临风高浪急严峻斗争形势,实现企业业绩稳定增长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困难面前,惟

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33]凯文·凯利在《失控》中研究全球企业转型发现,企业转型是从一座山峰跌入谷底再攀上另一座山峰的过程,下谷必定会经历损失,带来不可承受之重,要想转型成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我国企业家张瑞敏也认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踏上时代节拍的企业),但是一个企业不可能永远踏上时代的节拍,所以企业要像冲浪者,赶上下一个浪尖。转向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冲浪,冲过创新这一关。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在汽车行业卷加剧的整体形势下,比亚迪为首的国内汽车企业积极呼应国家新能源战略,大力推动汽车向新能源转型,企业业绩不仅没有受汽车行业整体周期下行的影响,反而实现了新的突破性发展。实践再次证明,惟创新者胜,惟创新者强。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在转型发展中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其二,这是实现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践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在2022年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202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鼓励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国家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34]2023年4月21日,第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要坚持系统观念,围绕“为谁创新、谁来创新、创新什么、如何创新”,从制度建设着眼一体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

创新体系。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上述指示和中央深改委文件精神,必须大力弘扬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引导更多企业经营者树立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把自己“逼上梁山”,向科技创新高地发起冲锋,肩负起党和政府嘱托的使命。

第三,把大力弘扬守法诚信精神与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长远发展之道。”^[35]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企业家要做诚信守法的表率。”^[36]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出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还存在不少不讲诚信甚至违规违法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存在既影响企业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建设和维护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也应该成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者。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守法诚信的我国企业家精神,既要推动党政职能部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也要履行自己责任,从我做起,做市场环境的建设者、维护者。为了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市监局在2021年加大了互联网反垄断力度(见图2),引发社会热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互联网企业的有意打压。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有些企业讲营商环境只讲一个方面,总是抱怨党政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从来不讲维护和建设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也要履行自身的责任,更要做表率。互联网反垄断根本不存在打压互联网企业的意图,也没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做,只是一次简单不过的正常合规执法。这次执法之所以让一些互联网企业感到痛,就是因为执法让一些早已形成经营习惯的违规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一些企业再想靠以往的违规手段“躺赢”不可能了,要防止后来者超越必须拿出真功夫。那些持人为打

压看法的人,要么为互联网企业违规竞争手段张目,要么是别有用心。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这些指示和意见表明党和政府支持互联网企业和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没有变。这次互联网执法引发的社会热议告诉我们,过去认为新兴经济领域是企业家精神高地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无论何领域的企业,都需要持之以恒地弘扬守法诚信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在新兴经济领域,由于存在监管滞后问题,更需要引导企业经营者做高水平经济体制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自觉抵制利用监管滞后潜规则投机取巧诱惑,真正靠创新硬功夫合规发展转向高质量增长轨道。

业。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广大企业家积极捐款捐物,提供志愿服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充分肯定。当前,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关爱员工是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同员工携手渡过难关。”^[37]202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民营企业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38]应该说,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截至2020年年底,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中,12.7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3.91万个村,产业投入1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4亿元,安置就业90.04万人,技能培训130.55万人,共带动和惠及1803.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9]企业经营者越来越深地认识到,只有不断在企业发展中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当前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企业经营者对履行共同富裕责任还存在说得多、做得少的问题。我们认为,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教育企业经营者认识到推动共同富裕与企业走向“专精特新”具有高度一致性。致力于“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的企业,对人力资本高度依赖,这就决定它们必须坚决抛弃单纯追求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做法,积极探索实行更能保障劳资共享发展成果的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我们看到,实行员工持股制和利润劳资7:3分配^[40]的深圳华为技术公司,成功走向了高质量发展道路,成为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代表。^[41]民营企业要树立“人工成本”不是成本而是投资的新理念,科学认识人工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从德国的案例看,相对高昂的人工成本给德国“隐形冠军”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带来了挑战。那么,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它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实现了员工薪酬与股东回报的统筹兼顾。这对我国民营企业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人工



(图2)

第四,把大力弘扬回报社会精神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结合起来。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企业家投身各类公益事

成本的持续上升是不可逆的长期趋势,抱怨或向社会甩包袱都是没用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名义工资虽然无法降低,但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实际有效工资(即单位产出的工资)。这就需要树立“人工成本”不是成本而投资的新理念。只要提高工资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即更低的实际有效工资,那么这笔工资就不是成本,而是一笔能够给股东带来更大回报的投资。这样的人工成本上升,对于企业来说,是越多越好。德国经验告诉我们,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并不矛盾。二者不仅完全可以兼顾,而且前者还对后者有加成作用。考虑到中国企业人才难招且员工跳槽率高^[42](平均1.5年跳一次)的严峻现实,企业弘扬履行社会责任精神要与推动共同富裕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体系,打造劳资共享发展成果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一是建立工资与利润同步增长制度。在健全优先保证工资足额发放财务管理制度基础上,保证员工收入增长与老板收入增长保持同步,普通员工收入增长与高管员工收入增长保持同步,使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建立在可靠的制度保障之上。二是建立失业风险劳资共担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应建立职工特殊辞退补偿金。在遭遇经济危机不得不辞退员工时,对于在企业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在法定辞退补偿金之外,再给予一次性大额补偿,由企业承担一部分员工失业损失。三是支持企业建立员工合伙制和员工持股制,且随企业的发展壮大相应扩大参与合伙和持股的员工覆盖面,使劳资两利、命运与共建立在牢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开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新篇章。



(图3)

第五,把弘扬胸怀世界精神与构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结合起来。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企业还要拓宽国际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43]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44]有多大的视野,就有多大的胸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成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过去10年,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更广更深参与国际市场开拓,产生出越来越多世界级企业。实践证明,胸怀世界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面对当前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国际环境,我国企业更要大胆走出去,只有在最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住考验的鸟儿才能展翅高飞。在我国企业走出去拥抱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些案例存在:2015年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创下美国酒店交易最高金额,复星集团以9.7亿欧元收购亏损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2016年海航以40亿美元收购卡尔森酒店,苏宁集团以2.7亿股份收购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70%股权,广东商人李勇鸿全资收购AC米兰俱乐部。有人质疑这些收购并不能带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其收购目的何在,是否存在以拥抱世界之名行向国外转移财产之实?在我们看来,作为局外人,我们对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不能妄加评论,但我国企业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把走出去与构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结合起来,通过走出去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华为在全球建设研发中心,招聘4万多名外国科学家为华为工作;吉利集团通过收购太力飞行汽车、收购或入股沃尔沃、宝腾、路特斯、戴姆勒一系列国际化战略布局,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在最新一期全球最有价值汽车集团品牌排名中上升到第9位,见图3)^[45]和企业整车技术能力;^[46]安踏通过收购国外品牌,形成“安踏、安踏儿童、斐乐、斯潘迪、迪桑特、可隆、小笑牛、安踏-NBA联合品牌”八大品牌产品系列,完成了从职

业体育品牌到大众体育品牌的华丽转身,从一个普通体育品牌进化到世界第三知名体育品牌,2017年市值首次突破1000亿港元^[47];奇瑞作为一个三线城市汽车品牌,连续5年获得国务院新闻办评选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20强”称号,2022年出口整车45万辆,占企业年度总销量的37%,占中国整车当年出口份额的14.5%,集团营收从2019年的1043亿上升到2022年2000亿。这些拥抱世界的案例,做的都是坚守主业、做强主业的事,都增强了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企业国际竞争力。这正如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所说的那样,中国企业要占领技术制高点,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与世界朋友和伙伴联合,通过协同与分享来做大做强。^[48]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企业要练好内功。^[50]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一个又一个行业结束了“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甚至“青铜时代”。^[51]把发展着力点始终放在练好内功上,是企业顺应新常态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从“大”走向“伟大”建成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2023年4月21日,第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表明党和政府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没有变,要变只会变得更好。国有企业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继续深化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民营企业要提升自己政治站位,增强发展信心、消除疑虑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要取长补短、协作协同、相辅相成,为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参考文献

- [1][10]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21.
[2][34][3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10.
[3]华为发布2022年报:十年研发投入近万亿创新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EB/OL】.https://www.360kuai.com/pc/9cb00be1530421e38?cota=3&kuai_so=1&sign

=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 [4]华为发布2022年报:突破乌江天险 华为决定自给自足:彻底摆脱对西方开发工具依赖【EB/OL】.https://www.chinaz.com/2023/0322/1508586.shtml.
[5]华为徐直军:过去三年完成78款开发工具替代,着力彻底实现战略突围【EB/OL】.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3-03-24/detail-imymycyf9793662.d.html.
[6]李泽江.59岁的郁亮和2024年的房地产市场【EB/OL】.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863057363/6f0bffd3019017o0k.
[7]房地产的第三场决赛:谁能跑赢?【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H3VMOFE40519MPBR.html.
[8]泽炎.企业促进共同富裕【M】.北京:大有书局,2022:159.
[9][德]西蒙渊(Simon,H).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M】.张帆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1] 权衡.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J】.经济日报,2023-1-5.
[12]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J】.人民日报,2023-12-18.
[13]施炜,苗兆光.企业成长导航【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264.
[14]2021财富世界500强平安、国寿等中国险企上榜【EB/OL】.https://new.com/rain/a/20210802A078MP00.
[15]刘俏.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55.
[16]徐静波.中日两国制造业差距到底多少年【EB/OL】.https://www.sohu.com/a/351167060_58018.
[17][18]刘俏.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52.
[19][20]刘俏.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200-201.
[21]工信部:四方面工作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EB/OL】.https://www.sohu.com/a/351167060_58018.finance.people.com.cn/n1/2024/0308/c1004-40191825.html.
[2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EB/OL】.https://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5747260.htmhtml.

(下转第22页)

深刻认识“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刘良军 黄月慧

【摘要】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必须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现代化,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现代化,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只有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才能推动各方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稳中求进、行稳致远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 最大政治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就是“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1]“政治者,众人之事也。由此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最大的政治”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充分说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绝非“一家之事”,也没有谁能“单打独斗”“包打天下”,而必须聚全党全社会之力,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积极因素,推动各方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稳中求进、行稳致远的磅礴力量。进一步言,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不是空穴来风、主观臆断,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只有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才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中华民族以更加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让亿万人民尽享现代化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刘良军,男,学士,中共荆门市委党校教授。

黄月慧,女,硕士,中共荆门市委党校讲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立足中国国情、契合时代发展、顺应中国人民意愿,因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行得通、走得稳、真管用,是因为其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是求得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基础上的最大政治。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人人都发光发热,才能“众人划桨开大船”“众人拾柴火焰高”。毋庸置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正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为着中国梦梦想成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才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才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然而正所谓人到半山、船到中流,不进则退、非进不可之时,越需要人人起而行之,争做中国梦的奋斗者、贡献者。只有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每个人都为中国梦添砖加瓦、增光添彩,才能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抵达梦想的彼岸,同时共享现代化之果,不

让一个民族、一个人掉队。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既藉由高质量发展不断做大“蛋糕”,也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努力切好分好“蛋糕”,实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定程度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必须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逻辑原点、实践起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党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奋斗目标的生动体现和鲜明呈现。我们党成立伊始,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确立为初心使命,矢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正是铭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亿万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才能推动人民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亿万人民深刻体悟到:当高楼大厦在祖国大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也必然巍然耸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好就好在其不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也同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需要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奉献者,而不能袖手旁观、作壁上观。因此从这方面言,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之命题同样成立,既强调立足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也强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亿万人民前进的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的精神更加昂扬、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绝非建立在牺牲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而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因而只有每个人都投身其中,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久久为功。因此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就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是福音、是机遇,而非危险、威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与“国强必霸”的偏执思维相左,同“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霸权思想有异,与殖民掠夺、侵略剥夺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不同,而追根溯源,缘于中华文明血液里、中华民族骨子里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而是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笃定人类只有一个未来,唯有和睦相处,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无疑,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就能让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认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良好外部环境。^[2]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正是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只有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现代化,才能更加自觉地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这一最大的政治励精图治、再接再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锋队”性质说明,党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任,而且始终冲锋在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无论是党成立至今、不断修改完善的党章,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不难看出党没有

任何自身特殊利益考量,有的只是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致力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实践一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要求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众星捧月”“众花向阳”,确保党中央始终有权威,能够有效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权威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一个稀稀拉拉、松松垮垮的组织是干不了事,也干不成事的。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矛盾风险挑战的考验,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是因为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任重道远、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时代变迁、形势变化,越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任何时候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题中之义、内在必然,否则便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三)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能够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伟大事业呼唤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推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迎来伟大复兴恢弘气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⑮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驶向更为开阔的水域。

(四)必须勇于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现代化,要求前进道路上,党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充满朝气活力。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成效。要把政治建设置于重中之重,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使全党同志自身清、自身正、自身硬。^⑯要深刻认识作风问题非小事,必须驰而不息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把党建设好、建设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可靠政治保证、组织保障。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现代化

之所以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因为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是为着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让亿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同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一)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追求

无论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还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为民惠民利民恤民的思想因子,也由此昭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我们党不可能漠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反却是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致力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进一步言,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真正成为大家的事,才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基层基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努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让中国式现代化绽放璀璨绚丽的光芒。

(二)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对于各级党员干部而言,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必须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最大的政绩,但具体造福群众的过程中,却必须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能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导致好心办坏事。实践证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位一体”,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有机组成。首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意味着党员干部必须切实端正事业观、权力观、政绩观,把为民服务、替民造福作为终身课题、永恒命题,坚决不劳民伤财、与民争利,乃至处心积虑、中饱私囊。其次,坚持发展依靠人民,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善于做群众工作,把群众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同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诚恳向群众请教,党的事业才能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最后,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价值追求,要求按照共建共治共享原则,稳步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民众,使之尽享中国式现代化红利。

(三)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尤其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即“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愈发说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涛声依旧”“今天重复昨天的故事”、一味地为发展而发展,而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主线,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呈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应该看到,今天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既有供给不足、低端低效的原因,也表现为有效需求没有得到适时满足。因此高质量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只有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才能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更加强劲。^[5]

(四)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心、聚人心。而要想赢得民心,关键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事实也是如此,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既需要登高望远,又必须脚踏实地。折射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现代化之上,就是除了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在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美好向往外,还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他们当下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解决好、解决到位。要坚持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主动走进基层一线,走到基层群众身边,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把迫切的期盼把握准,进而更为精准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解决好,才能让群众深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幸福之路,勇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急先锋”。

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论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原则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赫然位列其中。把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一)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巩固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塑造力显著提升,以“中国之制”彰显“中国之治”。因此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更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二)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坚定“四个自信”,归根到底是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此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自信自立、守正创新,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尤其铭记在五千多年深厚文化底蕴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具有时代价值的宝贵因子,同时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色彩,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扎根中华大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认同的现代化,才能群策群力、万众一心,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6]

(三)坚持问题思维、问题导向,实现改革由问题

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依靠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前进道路上要继续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要潜力,以改革促发展、促开放、促稳定。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灵活运用,始终坚持问题思维、问题导向来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牢牢聚焦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改革奔着问题去、朝着解决问题改,才能“一子落而满盘活”,既解决现有问题,又举一反三,不断优化体制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藩篱、扫清障碍。

(四)坚持系统思维、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畸轻畸重、厚此薄彼,必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支撑,同样不能失衡失序,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系统观念,协调推进、相得益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求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战略指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之添活力、增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之遮风挡雨、保驾护航,以全面从严治政为之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唯有坚持系统思维、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造福中国,也泽被世界。

结语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必须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

中国特色所决定,也由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把亿万人民连接、汇聚起来的桥梁和纽带,推动亿万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引领下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必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现代化,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深得人民拥护支持,激发人民热情参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参考文献

- [1]本报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1).
- [2]本报评论员.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人民日报,2022-07-31(3).
- [3] 欧阳淞.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N】.人民日报,2022-03-17(9).
- [4]戈岩平.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N】.宁波日报,2023-12-06(6).
- [5]陈冬,张庆守.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N】.福建日报,2023-08-29(9).
- [6]本报评论员.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5(1).

责任编辑:闫丽红

(上接第16页)

- [23][25][38][39]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J】.光明日报,2023-3-7.
- [2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5.
- [26]李婕.交卷!国企改革三年“大考”收官【J】.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2-22.
- [27]工信部公布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2-11-30/doc-imsmp8097773.shtml>.
- [2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66.
- [29]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EB/OL】. <http://zj.zjol.com.cn/news.html?id=628354&ismobilephone1>.
- [30][31][32][4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22.
- [33][36][37]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23.
- [40]王浩.近11万家民企帮扶12.71万个村【J】.人民日报,2020-11-22.

- [41]泽炎.企业促进共同富裕【M】.北京:大有书局,2022:172.
- [42]刘俏.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278.
- [43]华为2018平均年薪110万(上年是70万),任正非感叹“还是留不住人”【EB/OL】. <https://www.elecfans.com/d/878530.html>.
- [46]2020全球十大汽车集团榜单发布:大众夺冠吉利第九名【EB/OL】. <https://auto.gasgoo.com/a70168133.html>.
- [47][49]陈晨,刘坤.立时代潮头惠国计民生--企业家精神述评【J】.光明日报,2021-12-06.
- [48]安踏旗下的八个品牌是那几个,安踏收购FILA是怎么回事【EB/OL】. <http://www.lygmedia.com/news/finance20211201/0163169.html>.
- [5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68.
- [51]刘俏.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序)7.

责任编辑:王昊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和显著优势

李承儒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以完整的制度体系、广泛的参与机制、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构成了其丰富的内涵,其人民性、全面性、有效性的特征不仅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追求,更展现了其显著优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其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了对政党挟挟政治的超越,重塑了民主和治理的关系;多种民主形式的复合运行保证了民主参与的全覆盖、民主领域的全方位、民主环节的全链条,突出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有效弥补了单一民主形式的局限;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调适的发展优势不仅不断适应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更高要求,而且不断推动民主向“人民的统治”的本质复归,从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探索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内涵 特征 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对“代议制民主所包含的政治权利与民众利益适应性的内在矛盾的恒久命题”^[1]的有益探索,有效兼顾了“人的现实存在的双重性,既要考虑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要考虑人民整体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2]。作为具有完整制度体系和充分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和显著优势不仅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四梁八柱,构建起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

度体系;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核心搭建起“广泛、多层”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平台;以完整的监督体系保证人民民主的有序进行。因此,民主实行的制度保障、民主运行的参与机制、民主实现的监督体系一道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完整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民主

完整的制度体系是保障民主权利的基础,也是民主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3]因此,坚持和完善“全链条式的制度化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其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的职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主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履职实践构成全过程民主的集中体现”。^[4]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3年专项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发挥研究》(GSSYYB202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承儒,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权力。一方面,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无差别赋予广大人民,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结合使用,充分赋予了人民投票权,体现了民主选举的民主性和平等性;另一方面,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和各方面,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特别是选举法明确规定:“公民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9],有效避免了利益化、集团化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保证了人民代表替人民行权、为人民发声。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不仅被赋予制定、修改宪法和其他基本法的权利,而且行使事关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报告、决议的建议权、审查权和批准权;不仅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人事任免权,而且对于所授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突出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10]的典型特征。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提供了人民政治参与的平台,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7]。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多层联动的体系,为全社会意愿和诉求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实现了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决策实施的科学性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人民政协作为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从制度安排上看,通过“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议、协商座谈会议等,开展提案、委员视察考察、专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等经常性工作”^[8],针对国计民生和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决策时、决策后广泛开展协商,保证了协商民主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从利益代表上看,“人民政协设有全国委员会和省、市、县(区)委员会四个层级的3200多个组织,各级政协委员有60多万名;全国政协设34个界别,涵盖8个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9]充分保证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群众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持久性。

3. 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是主权在民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各族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极大增强和调动了各族群众参与国家治理、享受公民权利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不仅“有效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10],更有效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广泛汇聚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群众力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制度形式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权利,增强了各族群众国家主人的自豪感。不仅从宏观上保证了各族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更从民主的具体实践上以国家部分法规政策的变通执行和自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施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法律的有机统一,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增进了民族团结。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以村(居)民议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方式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和以村(居)委会为主体直面问题冲突、直接疏导化解矛盾、直接协调保障利益提供法制化保障。通过探索民情直通车、居民论坛等多种民主形式丰富积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造性、实践性发展提供了活力之源。

(二)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稳定参与机制的社会主义民主

一个国家民主与否的关键是人民是否能够行使国家主权,是否享有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和各项法律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了人民依法、有序、广泛、稳定参与国家事务的机制,更“通过建立人民建议制度、立法意见征集制度、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等,实现了公民全面、广泛参与党和国家机关的决策、管理、监督”^[11]。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制度的设计

充分保证人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治理的参与权,实现了对“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12]的虚假民主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广泛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各环节,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具体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展现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生动图景。国家宪法和选举法充分保障了每个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通过对县乡两级人大的直接选举组成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的选举表达自己的意愿;通过民主恳谈会、议事会、听证会等民主协商形式平等表达利益诉求,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通过村(社)民代表大会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参与村(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通过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组织广泛参与基层事务的管理,履行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通过信访举报、网络问政、政务公开、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履行监督权。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建设,保证着“全体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参与”^[13]。

协商民主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人民能够广泛、多层、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和路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成了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各层级、各方面的协商民主形式,实现了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公民与公共决策脱节的超越。人民政协作为体系完备、架构完善、制度规范的协商民主主渠道,不仅“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关涉的为何协商、与谁协商、如何协商等核心问题给予作答”^[14],更统筹带动了其他协商主体的发展,提升了协商主体的参政议政能力,不仅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渠道和稳定平台,更以特定的平台路径将协商民主贯穿于我国人民民主实践的全过程。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全方位监督体系的社会主义民主

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关键是形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监督和纠错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因公共权力的滥用而造成

的腐败和对公民权利的伤害。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将“权力运行是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作为评价国家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重要标准,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监督,形成了以“人大监督”为核心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不仅保证了人民对公权力的监督权,更通过制度设计“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价值追求使然。《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和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发挥着汇聚合力、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并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让人民监督政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更是人民主权的根本体现,所以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推动完善监督体系的强烈意愿。

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将自我革命作为保证权为民用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15]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又一答案,以刀刃向内的巨大勇气,“宁负千百人、不负十四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立党之基、执政之本,不断提升自我革命要求、提升管党治党水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纪律教育等手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自觉将全方位监督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设计的价值遵循。

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方位监督体系的形成依靠完善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式民主长期性、稳定性的有效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以立法形式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反腐监督工作机构,实现了对监察对象的全覆盖;以约谈函询、巡视巡察、考察考核和民主评议、民

主生活会、事项报告等多种手段推动纪检、监察、审计、司法、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媒体、公民、网络和社会组织对公权力运行监督的全覆盖；以多元化的人民监督途径提升人民直接监督的效能，特别是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了权力运行监督和民意表达的扁平化，提升了民意表达和对公权力监督的覆盖面、参与度和影响力。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特征

全过程人民民主因其完善的制度保障、稳定的参与机制和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有效调节着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不仅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更汇聚起了发展合力，充分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性”“全面性”“有效性”的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优势。

(一)“人民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属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本位的民主形态。与资产阶级民主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不同，人民民主强调个体自由与社会平等的平衡，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运行国家权力、国家事务以人民事务为根本”^[16]成为人民民主的典型特征。同时，由于选举权的无差别赋予，不仅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经济实力决定政治地位的超越，更有效避免了利益集团裹挟政治权利的弊端。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特征体现在国家权力的人民赋予上。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反复强调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人民性”特质。因此，无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重要制度的设计、运行和完善，都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我国的民主建构以“国家是人民的”为基础，以人民本位、人民主权、人民作主和人民参与^[17]为核心，通过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体现人民国家治理主体地位、发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互补充的优势，探索出了一条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制度，搭建起了人民参与政治的广阔舞台，特别是人民政协作为民主协商的专门机构，以多种参与方

式和多层协商平台实现了对“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特征体现在国家权力的人民行使上。

全过程人民民主统筹民主政治和治理效能，“将民主视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真实有效中介”^[18]，把人民意愿的有效落实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导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机制的设计、党和政府工作职能的安排、党和政府重大议题的确立上，都始终体现着“人民性”的价值导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基所在，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广泛政治参与、完善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通过自我革命洁净党的肌体的目标所在。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特征体现在国家权力的价值导向上。

(二)全面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要看”和“四个更要看”明晰了衡量政治形态是否民主的根本标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环节的全链条、民主领域的全方位、民主参与的全覆盖保障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国家权力为民所用，保证权力在人民监督下运行，体现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性”的本质特征。

1.民主环节的全链条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的民主环节，保障人民群众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保证人民的选举权和参与权；以村(居)委会为核心，村(居)民大会为主体保障人民参与公共决策和民主管理；以恳谈会、议事会、协商会等途径直接表达意愿和诉求，在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的职代会上参与管理过程，实现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在对国家公职人员和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中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

2.民主领域的全方位

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19]，与西式民主聚焦政治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民主观念在政治运行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全覆盖，把民主从票决政府首脑和政治代表的

选举民主引入公共治理的各方面。从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有机贯通,到民主协商议题的设立、调研、审议、决策、反馈,再到民主运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和全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政治民主和社会领域民主有效衔接,把国家大事和社会琐事全面覆盖,保证了民主内容的整体性和民主覆盖的广泛性,使得人民意愿和群众呼声广泛地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面。

3. 民主参与的全覆盖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主体确保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依法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20]都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主体,从参与范围上保障了广泛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作为整体,将每个人置于国家主人的地位,打破了资本逻辑根据市场地位确定社会地位的运行规则,做到了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保障了参与主体的整体性,做到了民主参与的全覆盖。

(三) 有效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追求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21]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现实化,全过程人民民主遵循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的原理,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因此,如何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所在。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逻辑上,首先是通过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通过统筹民主政治和治理效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望,从而提升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广泛性;其次是通过无差别的政治权利的赋予和全链条的民主环节的参与保证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作为民主权利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最后是将人民满意与否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通过及时收集、协调、处理、反馈人民的意见建议,不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是其有效性的保障。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将经济基础作为其底层逻辑,从根本上消除了虚幻性民主的理论基础。因此,阶级

社会中的民主形式作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远不能保障政治权利的行使总是服务于民众的利益”^[22],社会形成的众意于统治阶级而言是异己的,政治权利和民众利益难以适应的矛盾张力使得西方民主的虚幻性难以消除。社会主义民主因其“人民本位”的价值理念,使其能够兼顾个人发展和集体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3]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民主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其真实性因使命型政党的初心使命得以有效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用“八个能否”作为衡量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标准。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最管用的民主制度,就是因其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和民主运行的真实性作为支撑,实现了良政和善治的结合。一方面,“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要求成为人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的系统性制度建构的价值旨归;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保障绝大多数人利益为其合理性根源,形成了国体和政体、形式和内容、良政和善治的统一,实现了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24]。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是最管用的民主。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因率先完成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在现代民主建构中具有引领性。而西方社会以“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已然成型的国际秩序以及潜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优势”^[25]占据了“现代民主”的话语权,无论是“民主”的内涵阐释、制度建构、实现路径甚至是评价标准都被其所垄断,对民主问题的探讨被限制在了如何“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框架内。随着西方民主陷入治理衰败和民主衰退的双重困境和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变化,人们似乎发现“几乎没有经验可以证明现有的高效运转的政府是通过高质量民主的建立而产生的”^[26]，“民主”与善治似乎已经分离,民主衰败、民主失效、民主异化的问题让西式民主陷入了困境。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不仅

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进行了理论提升,为走出西式民主的困境提供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稳定的参与机制、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保证了人民主体地位,更通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多种民主形式的复合优势和不断自我调适的发展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

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能够作为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代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并且能够代表该阶级或阶层掌握或干预国家政权,为代表阶级和阶层发声。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党,往往代表特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论是一党制、两党制抑或是多党制,“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或联合或交替实行的阶级统治”^[27]。资产阶级政党成为采取一定行动谋取国家政权的团体,其谋求良政善治的目的弱化,为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谋求政治影响力和干预公共决策的目的凸显。因而“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28]的西式民主使得政党或政治团体对选举结果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社会进步力量和弱势群体诉求的回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因资产阶级和社会整体间的利益分殊而不断展现,社会撕裂、经济衰败、治理失效等问题层出不穷。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用最真实最有效的民主形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大优势。

一是超越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核心,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作为“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政党维护特殊阶级利益的超越;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发挥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互相补充中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职能和优势,实现了对西方政党“作秀式”选举的超越;作为民族复兴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团结各阶层、各领域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以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了对西方政党互相攻击、相互掣肘的超越。

二是重塑了民主和治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将民主政治视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公平正义需求的有效手段,通过不断完善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用畅通的民主参与途径汇集分散的意见建议,形成人民整体意志,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协调能力保障国家机关的高效运转,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式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造成的国家机关之间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等弊端”^[29],实现了良政善治和人民诉求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和制度建构的主体,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人民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由不同的阶层、群体构成的集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汇聚各方意见,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整体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式保证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的有机统一。

(二)多种民主形式的复合优势

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历经古典民主、近代民主和现代民主,形成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精英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共和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但随着西方社会在现代民主建构中的率先发展,现代民主理论、原则、形式和制度被垄断,“代议制被视作适应客观实际的最好体制,成为西方民主的基石”^[30],竞争性选举被视为更具可操作性的民主形式。因此,现代民主理论被“竞争性选举”所垄断,选举民主成为能够“包治百病”的民主形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认为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存在

局限性。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传统有差异的情况下,任何单一的民主形式都不能完全体现“人民统治”的民主本质、发挥民主制度人民意志和治理效能相统一的优势。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和民主环节的全链条覆盖从民主结构和民主形式上进行复合推进,充分发挥了多种民主形式的复合优势。

一是充分保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作为一个复合概念,是“由不同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构成的具有较大异质性的社会集合”^[31]。因此,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实质上是政治体制能否统筹兼顾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完整的制度体系、稳定的参与机制、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相互补充弥补单一民主形式的局限,以人民政协的平台和统一战线的法宝保障民主实现的多样化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起社会各阶层力量、反映社会各阶层诉求、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有效避免了阶级民主仅代表特殊阶级发声、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弊端。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社会合力的独特优势保证了作为整体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二是有效弥补单一民主形式的局限性。无论是古希腊雅典以公民大会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制,还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以竞争性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都摆脱不了“多数人的暴政”和“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32]的困境。因此,“过度强调民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因素,并以此为制度支柱而建立的民主制度”^[33]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而无法真正体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多种民主形式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作用,展现了参与式民主和回应式民主保证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实现了对单形式、单要素民主功能简单相加的超越,使得人民当家作主能够落到实处。

(三) 不断自我调适的发展优势

人类社会在现代民主的建构中,由于西方社会的率

先发展,现代民主理论、原则、形式和制度被进行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构建和阐释,代议制民主和竞争性选举成为现代民主的同义词。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要素重新布局的需求使得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利益团体竭尽所能地影响公共决策,精英民主以程序正义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建立稳固的政治联盟,进而保障精英享有特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逻辑使得经济权势集团为捍卫自身地位寻求与政治的联姻,西式民主在与资本主义的相互成全中“主动放弃了对自身的反思性维度和系统性调适改进的自觉”^[34]。所以,西式民主被绝对化为“竞争性选举”,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么被归咎于“不够民主”,要么被强行与政体类型脱钩,使得民主的发展囿于西式民主设定的范围和框架,西式民主的霸权成为民主发展的束缚。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非西方的民主形式,秉持“一个国家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35]的观点和立场,以人民的满意与否为评价标准,强调“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36]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和不断丰富的参与机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广泛的政治参与中谋求个人发展与良政善治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特点和优势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得到充分彰显。

一是不断推进“民主”本质的复归。从希腊语“民主”(demokratia)的词根看,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然而,经由约瑟夫·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程序性改造,竞争性选举代替人民的统治成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金科玉律,公民权被异化为“一种远离政治参与的、消极的、被动的抽象公民权”^[37]。而全过程人民民主认为民主政治应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38],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设计和自我革新、自我调适的发展优势推动民主向“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共同福利进行的”^[39]的本质的复归。

二是广泛开辟了民主的发展空间。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依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其“所主张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缔约基础上产生的

政府权力,在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充其量只能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只能是剥削阶级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工具”^[40]。因此,西式民主把对“民主”的探讨限制在“产权规定、市场规律、资本规则”的范围内,将政体类型与治理绩效分化剥离,使得西式民主的反思和调适改进自觉地陷入单纯的技术和程序维度。而全过程人民民主认为没有定于一尊的民主模式,“决定人的权利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发展”^[41]。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障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多种民主形式的复合安排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力量、反映协调了社会各阶层诉求,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成就重塑了民主和治理的关系,为人类社会找到了“以平等求民主、以民主求善治、以善治求和谐”的民主发展道路,打破了民主化等于西方化的霸权和垄断,开辟了民主发展的崭新空间。

参考文献

- [1][4][22] 程竹汝. 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人大履职实践的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4, 26, 14.
- [2][16][17] 林尚立. 论人民民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22, 85, 28-29.
- [3] [15]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97, 249.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N】. 人民日报, 2015-11-26.
- [6] 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45.
- [7] [8][10][21] 国新办. 中国的民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5, 15, 19-20, 2.
- [9] 任仲文. 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2: 63.
- [11] 陈尧. 建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路径——基于公民参与的视角【J】. 学术前沿, 2022(03上): 43.
- [12] [23][36][38]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30, 482, 530, 532.
- [13] 王宗礼, 韩世强. 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与实践要求【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01): 76.
- [14] 侯东德, 郑银. 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9(2): 43.
- [18] 张明.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4): 91.
- [1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9-22.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75.
- [24] 俞可平. 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N】. 学习时报, 2014-11-3.
- [25] [34] 林毅. 重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J】. 探索笔会, 2022(2): 52, 56.
- [26] 弗朗西斯·福山. 为什么民主的表现如此糟糕?【J】. 周艳辉,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8(5): 77-83.
- [27] [29][40] 王宗礼. 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M】.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27, 29, 28.
- [28] [美]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96.
- [30] 桑玉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3.
- [31][33] 王宗礼, 郎得明.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性优势【J】. 理论探索, 2022(4): 50, 49.
- [32] 列宁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91.
- [35]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7.
- [37] 陈晓斌, 刘同舫. 西方现代民主的政治逻辑和理论困境——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考察【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6).
- [39] 包刚升.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4.
- [41] 王新生.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N】. 光明日报, 2021-08-13.

责任编辑: 闫丽红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西部地区T县为例

李晓蓓 李玲珑

【摘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讨论主要涉及政治参与、经济建设等方面,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层面的研究。本文在充分挖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独特性价值与对产业振兴重要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对西部地区T县的考察,发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出的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乡村振兴 西部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中就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1]。民营企业的出资人主要为民营企业人士,民营企业人士作为其核心部分属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因此,需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和指导。从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九大再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经济开始逐步发展,在这一阶段,个体经济逐渐增多,私营经济也出现了萌芽,政策环境逐渐放松,为非公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

此时,出现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外资、民营和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人士等”^[3]。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非公经济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实现了快速地成长。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公经济开始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同质化现象严重以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品牌、服务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非公有制企业从一味追求高速增长和规模转向高质量和高效发展,在此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积极参与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力。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数量不断增多,与之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

在经济发展方面,葛伟、武梅磊提出“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这说明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也可以发挥企业家精神,为乡村的经济发展做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西部地区新乡贤融入基层统战工作研究”(ZK20230228)的成果。

作者简介:李晓蓓,女,博士,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玲珑,女,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出贡献。张良深入“探讨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趋利性和社会性,并认为平衡两者关系是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9]。这一研究对于理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的行为动机和角色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参与方面,姜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和对待非公有制人员的政治参与,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要通过改善政治参与环境,健全平台载体,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强化价值引领,发展非公企业党建等方式来有效进行政治参与”^[10]。董明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引导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11]。这些论述凸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为提升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提供了方向。在思想引导方面,郝国信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平台建设和载体创新,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12]。肖鹏燕提出“深入理解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价值观方面的特征,强化年轻一代的企业家精神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年轻一代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13]。这些论述表明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

目前,学术界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经济建设、政治参与、思想引导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资源,已经为乡村的发展贡献了一系列卓越成果。但这些贡献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他们的独特价值仍未被充分挖掘,其影响力也未能进一步扩大。因此,要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且全面的分析,以明确其发展潜力与方向,从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充分挖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意蕴,并且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西部地区T县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所作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意蕴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4]。“万企兴万村”行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民营企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仅展现出与国企、政府、农民不同的独特价值,而且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独特价值

与国企相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企业经营决策更加灵活自主,较少受到政策指导和行政干预,这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创新意识,能够发现商机并勇于开拓创新。在乡村振兴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为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纲领和指南,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极其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导向”^[15]。国企往往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资源优势,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但该主体往往承载着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其经营目标和决策过程可能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影响和指导。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政策,提供农业技术支持,推广农业保险等方式,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政府具有公共性、法定性、执行性、强制性等特性,主要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比之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作用更加灵活和多样,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资源条件,选择不同的投资领域和经营方式,如农业、旅游业、手工艺等,这种灵活性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满足当地农民的需求,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与农民相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要活跃在工商业领域,他们通过经营企业、提供服务或参与投资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其经济活动更加多样化和市场化。而农民主要通过耕种、养殖、加工等活动,为乡村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产业振兴的作用

“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支撑乡村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支柱,乡村产业振兴在整合城乡要素资源、汇集先进产业技术的同时,也不断促进乡村经济发展”^[16]。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创新引领、资源整合、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乡村产业

振兴。在创新引领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企业家,对市场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把握市场机遇。同时,他们勇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和科技应用,不断推动产业的创新发展。创新意识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产业振兴中能够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在经济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创办企业、投资项目等方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他们还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和资源网络,整合资源,推动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经济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产业振兴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他们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这些经验和知识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产业振兴中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提升产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和竞争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还能够通过培训和交流等方式,将自身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其他人,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和发展。

三、T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的成就探析

“T县位于甘肃中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华书法之乡”“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等称谓”^[12]。党的二十大以来,T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五五”发展举措,培育壮大草畜、果蔬、中药材、新能源、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六大现代产业园区”。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T县积极落实“万企兴万村”的行动,广泛宣传动员,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有序参与到全县的乡村振兴中来,在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增加农民收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T县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为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注入了活力。在产业链方面,他们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通过研发新产品和改进现有产品,提供更具吸引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T县内B公司在已有的天然健康的金银花茶等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研制出了金

银花酒、金银花新型饲料添加剂、日用品等系列产品16个,实现了金银花的花叶枝的全面利用。在供应链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供应链效率。T县内C公司立足马铃薯产业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马铃薯产业建圈强链、降本增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发挥现代化农业产业链平台优势,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延伸马铃薯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智慧农业不断向前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扎扎实实立足国内市场,积极稳妥开拓海外市场,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将该企业打造为行业引以为傲的马铃薯淀粉品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并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助力乡村振兴。他们通过农产品种植、加工及销售等环节,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另外,他们通过创办企业,为乡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T县A公司在中药材的种植中,推进规模化种植,通过引导农民开展规模经营,提高集约化程度,提升了中草药的产量和质量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他们提供种子、肥料、技术支持等生产资料,并且对农民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民提高中草药种植的技术水平和产量,也提升了农民的种植技能和管理能力,使农民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在农产品加工方面,A公司致力于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引进先进的加工技术和设备,对中草药进行深加工,开发了许多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如中药饮片,保健品等,从而增加了公司的收入。在农产品的销售方面,该公司通过收购农民种植的中草药,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水平。他们投资修建道路、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改善了乡村地区的交通、水利和通讯条件。这不仅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也有助于吸引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促进城乡互动和一体化发展。T县D公司作为一家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在了解到T村因为没有路、土地撂荒严重的情况后,新修5.2公里农路、整治撂荒地350余亩。T县E公司因地制宜,为了方便乡村交通加宽了道路,在道路

两旁栽植两百余棵松树。并新建了老年人健身广场,生态停车场也在预备筹建中。

四、T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确实在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增加农民收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T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仍存在对思想政治建设认识不足,服务方式单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农民、政府的互动不足等问题,影响其价值机制的有效发挥。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对思想政治建设认识不足

T县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思想政治建设缺乏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的能力与动力,他们推动了农村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但大部分人的思想还是很保守的,很容易被传统的思想所左右,对于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第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党情国情了解不够,在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也有一些偏差。“工商联作为党委、政府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将会进一步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3]。然而,目前各级工商联所属的商会,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而且因为党委或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缺乏参与,这就导致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和管理方面的薄弱。第二,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普遍缺乏归属感、存在感、认同感,服务意识不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民营企业党员干部对党员身份的理解存在误区,更注重追求经济利益,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机制。第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刻含义及目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他们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得还不够到位,他们普遍认为这类教育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此常常以敷衍了事的态度应对,从而严重削弱了教育实践的实际效果。此外,一些地区的工商联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缺少主动性、针对性,没有密切地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制订出富有成效的活动措施和计划,这样的

方式导致了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式化,使得原本应该具有实效性的教育活动变得“空洞”,导致了“脱实向虚”问题的出现。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服务方式单一

首先,T县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虽然通过农产品种植、加工及销售等环节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并且提供了就业岗位,但提供的方式十分有限,他们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具体内容、扶持措施以及实施要求等了解不够深入,导致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也难以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其次,T县目前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农业产值占比较高,尽管近年来T县也开始积极探索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整体上,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这种产业结构特点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参与乡村振兴时,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切入点和发展方向。最后,T县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于自身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他们在行业角色认知上存在模糊,不清楚自己在整个产业链或行业生态中的具体位置和角色,难以满足乡村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政府、农民之间互动不足

目前,T县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行政管理层面显现出一种集中化和封闭化的态势,这导致了双方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不足。尽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渠道参与政府、人大和政协等机构的活动,但他们在这些场合中的对话影响力却相对有限。尤为突出的是,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之间尚未建立起一个健康、有序且互动性强的沟通平台和机制。由于缺乏一个全面覆盖、平等且系统性的交流平台,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T县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资修路,修建生态停车场,完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缺乏与政府的紧密沟通与合作,导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完善基础设施中项目选择方面缺乏明确的指导,难以与政府的整体规划相协调,这将导致资源浪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用地难等问题。在制定政策时,政府无法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诉求进行适当的回应,而有关的非公企业,因为对政府的长期规划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无法及

时、有效地制定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需要的发展规划。T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农民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导致双方互动不足,这是因为双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和定位不同所导致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常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发展,而农民主要在农村或农业领域工作,这种差异就会导致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或者缺乏共同目标。T县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虽然在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发展策略方面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存在脱节,双方共同目标的缺乏导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农民之间合同协作的机会减少,以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难以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和关切。另外,由于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农民之间可能存在信任危机,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注重经济效益和长期发展,而农民更注重短期收益和生产生活质量的提高,某些情况下,双方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这就导致双方难以形成合作关系。

五、积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为应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强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引领、扩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服务方式、为他们搭建服务平台实现良性互动等实践路径,以求T县在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一)强化政治引领,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

政府应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中的特殊性价值,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引导工作,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开展“同心建功新时代”等系列活动,利用微信公众号、统一战线宣传工作微信群、QQ群等宣传载体,及时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央和省市县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省市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县委、县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营经济政策信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践行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通过开展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征文、“学思践悟二十大 翰墨丹青筑同心”书画展、“书香民革

同心共读”等系列活动,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赴B镇红军长征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引领T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增进政治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有深入的了解,主动投入到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去。通过定期的政治教育、集体学习、座谈讨论等方式,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引导他们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判断力;各级工商联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加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引导非公经济组织将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群体负责人及生产一线员工,纳新优秀骨干,通过教育培训活动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引领。同时借助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支持,有效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员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统战部门应设立专门的工作组织,负责协调、监督和评估教育投入的效果。通过定期收集和分析教育活动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和改进教育工作,确保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要加强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联系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诉求,为他们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政治教育服务。

(二)扩展服务方式,明确服务目标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积极主动地通过研究乡村经济建设的政策文件、参加相关会议和等方式,了解当前乡村经济的现状和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业务范围和发展目标确定服务方向,扩展服务方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与农业专家团队合作,组建或聘请农业专家团队和技术服务队伍,为农业龙头企业和休闲观光农业提供服务,还可以探索实施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到涉农企业挂职等人才服务形式,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智力储备和人才支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通过与政府合作,创新土地供给保障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认清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定位,通过结合自身的业务专长和资源优势,寻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契合点,为乡村提供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支持。

(三)搭建服务平台,实现良性互动

政府相关部门、农民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真正地密切接触,方能真正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力量。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间,以及农民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间,搭建一个畅通的双向交流通道,鼓励政府官员、农民、企业家等多主体参与到对话与交流中来,一起研究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T县应当积极主动地搭建起一个高效的交流平台,旨在实现各方交往有道、互动良性的目标。通过定期举办各种研讨会、座谈会、论坛,为政府部门与企业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和企业可以分享最新的政策信息、市场动态和技术进展,交流各自的观点和意见,并通过有效的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和分歧。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推动双方在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T县政府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措施,来鼓励农民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农业,工业等领域开展合作,提高双方共同目标和利益,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引导民营企业把自己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个人的富裕和农民的富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不同的方法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同体,让他们共同富裕,互相合作,共同发展。

六、结论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一社会群体,已经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研究以T县为田野点,发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仅通过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为产业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和提供就业岗位,有效促进了当地的人才振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还积极参与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T县的乡村振兴进程。但是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和广泛认可,导致他们在思想认识、服务方式及与农民、政府之间的互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探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别于农民、政府、国企的独特性价值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产业振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呼吁社会各界高度重视这个群体,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强化政治引领、扩展服务方式、搭建服务平台

等实践路径,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并为其他地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路径与经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0.
-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100个由来【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271.
- [4] 葛伟武,梅磊.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J】.民主,2020(5):29-31.
- [5] 张良,魏国力.浅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趋利性和社会性【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0(3):78-79.
- [6] 姜琳,韩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问题与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0(10):146-148.
- [7] 董明.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治理研究,2019,35(01):71-81.
- [8] 郝国信,王艳杰.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政工作【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0(6):52-53.
- [9] 肖鹏燕,王飞鹏,刘丽.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及价值观特征浅析【J】.中国人事科学,2021,(12):31-41.
- [10] 范红.新时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战略分析【J】.市场瞭望,2024(08):144-146.
- [11] 黄敦平,于轩.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淮阴工学院学报,2024,33(01):58-62.
- [12] 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00.3.
- [13] 孙敏,刘倩.引导我市非公经济人士积极参政议政【N】.桂林日报,2022-01-12(005).

责任编辑:闫丽红

发挥统一战线作为 推动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

王 昊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本文沿着时代发展逻辑和内在关联逻辑分析两者的内在关联,阐述了发展低空经济存在的机遇、不利因素及对策,重点从“制”“新”“质”“数”四个方面提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抓住的着力点;最后提出低空经济发展中统一战线应有的作为和担当。

【关键词】统一战线 低空经济 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东北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之后,其理论意蕴和实践指向成为各界关注焦点。2024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府十大工作任务之首;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都充分凸显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考量。

而以低空经济等为代表的一批战略新兴产业在打造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正在和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当“低空经济”四个字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一个侧面说明有效打造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产业意义重大。

一、新质生产力与低空经济

(一)新质生产力与低空经济的时代发展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近年来,由于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冲突、经济打压和高科技技术封锁等因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经济发展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高科技发展瓶颈等难题,“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的生产力理论横空出世,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利器,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引领创新创业、重塑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关键着力点。塑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土壤,将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新动能,新力量。

低空经济是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包含制造、飞行、保障和综合服务四大产业。^[2]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广泛体现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中,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保障、服务国防事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赛迪顾问智能装备产业研究中心2024年4月发布《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59.5亿元,增速达33.8%。随着低空飞行活动的日益增多,低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成效的逐步显现,乐观预计到2026

作者简介:王昊,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民用无人机已经成为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力机型,2023年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达1174.3亿元,同比增长32%;工业级无人机在应急保障、能源巡检、农林植保等场景中应用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产业规模达766.8亿元。

(二)新质生产力与低空经济的内在关联逻辑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低空经济也恰好具备匹配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联系。一是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质特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低空经济具备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其高科技体现在以创新技术贯穿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如制造端的新材料、新能源、新机型,服务和保障端的北斗导航、卫星互联网、5G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其高效能体现在将传统二维地面经济拓展为三维立体经济,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其高质量体现在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贯穿行业发展的全链条中。

二、发展低空经济存在的机遇、不利因素及对策

低空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低空经济赋予新定位,提出新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等文件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已经不局限于1000米或3000米的范围。

(一)低空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利因素

1.从政策层面来看,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和相关实施细则,地方实际落地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是由于尚无符合低空经济新形态特征的智能化监管手段,目前低空飞行审批政策沿用成熟民航监管体系,难以匹配未来大批量、大范围、密集型使用场景。二是国家顶层设计如何实现落地,各地方政府还在探索研究建立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细则,目前虽然上海、河南、深圳等地出台了低空经济发展方案,但各地都是自我摸索,缺乏协作发展意识,协同发展有待加强。

2.从产业层面来看,低空经济产业市场规模较

小,产业环节分布不均衡。当前低空经济产业价值主要集中在上游制造环节,其在市场规模中占比近九成,产业整体发展“头重脚轻”,缺少串联抓手;南方发达地区响应快,布局早,实力强,东北和西部地区相对滞后,区域不平衡,市场规模更为小弱。

3.从应用层面来看,低空经济的生态应用价值尚未充分彰显。toB(即to business,指面向企业,为企业提供服务)、toG(即to government,指面向政府,为政府提供服务)方面,目前应用集中于应急通信、能源巡检、城市治理等小规模试点场景,大部分领域尚处空白。toC(即to customer,指面向个人,为个人提供服务)方面,现下应用单一,以航拍为主,用户消费欲望不强、需求不足,需要拓展新的应用场景。

(二)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对策

基于低空经济具备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产生的先进生产力特征全要素,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抓住以下四个着力点,充分体现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新增长引擎的先进性和澎湃活力,包括实施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引领与地方层面科学推进等对策。

1.顶层设计层面,抓住一个“制”字,把准航行舵

我国要把火热的低空经济转化为有效和高效新质生产力,需要顶层设计方面抓住“制”这个关键词,把握好对生产要素的创新性政策机制配置,下好布局谋篇棋,凸显党在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性、前沿性作用。所谓“制”,强调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以奥地利熊彼特为首的西方经济理论学家在创新上强调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加强调国家在科研创新体系和进程中的引领支持作用及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点和优势点。^[2]目前,国家在制度策略层面已经高度重视制度环境的创新发展,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纳入了我国发展蓝图;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包括低空经济在内的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1月1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实

施,使得无人机产业进入“有法可依”新阶段,进一步刺激了低空经济的发展。要使低空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顶层设计层面还需要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布好局谋好篇,把准航行舵。

一是聚焦低空经济“二向三元四维”的供给和需求生态链,完善制度、优化供给,优环境,强激励,助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如持续完善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体系,完善现有相关制度和指标体系,按需并前瞻制定出台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政策,推动低空经济有序健康高速发展。

二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的法治规范,推陈出新,助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的法制规范是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低空经济的顶层设计方案相应要做到精细化、具体化,明确各方职责,使低空经济发展渐次规范推进。

三是完善有效监管手段和实施细则。相关部委要积极论证研究,出台符合低空经济新形态特征的智能化监管手段和实施方案,以满足今后低空产业大批量、大范围、密集型使用场景的需求。同时,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研究制定细则。而目前仅有上海、河南、深圳等为数不多的地区出台了较为详细的低空经济发展方案。

四是要深化低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加快推进央地之间、军地之间、部门之间、政企之间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构建与低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更高水平的供给满足和创造更高质量的需求。

2.创新发展层面,抓住一个“新”字,定好增长极。当下,面向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任务,要求我们前瞻研判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多并举,推进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一是要重视以科技创新打造低空产业核心引擎,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抓住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把握场景驱动创新和通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科技与产业范式变革契机,以科技创新引领低空产业创新,优化低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打造推进低空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强力引擎。

二是强化低空产业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培育企业核心能力、动态能力、先导能力,以企业强推动产业强。要强化低空产业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鼓励和带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融合联合体和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新要求新场景,实现低空产业自立自强,推进自主创新、开放创新、集成创新协同全面发展。

三是加快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培育低空经济发展新动能。

要加快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发挥其对低空产业技术创新范式、组织模式和生产力构成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利用通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以前沿性技术创新成果催生低空产业生产力的新动能,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3]

3.战略发展层面,抓住一个“质”字,把稳压舱石。要把我们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低空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低空产业体系,必须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形成领军理念,培育领先市场,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让我国成为智能化时代低空产业领域新技术新企业的首发成长地和一流发展域。要深刻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与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三化三性”特点,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低空经济与新一代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和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吐故纳新,在国际化大环境大空间中提升技术和产业竞争力,把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实。^[4]

一是要致力于壮大形成我国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方面,就现状而言我国2.0版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增了低空经济与空天产业集群。低空经济产业集群要当仁不让,脱颖而出,当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集群的领头羊,引领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同时各产业集群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分类施策,精准培育,从而巩固优势领域、锻造中坚力量、补齐短板弱项。

二是要建立我国低空经济现代化新型产业体系。围绕“管得好”“飞得好”“用得好”三方面,面向大

批量、大范围、密集型应用需求,建立唯一身份识别码、设备登记的完备管理体系,以低空智能网联为基础,对各类飞行器进行全生命周期登记管理,实现设备应用全程可视、可管、可控、可溯,使得监管技术革新保障低空空域“管得好”,通信基础设施支持低空飞行“飞得好”,低空智能网联赋能低空应用“用得更好”,构建监管更加有效、产业更加均衡、应用更加智能的高效治理体系,依托高质量高水平为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技术革新层面,抓住一个“数”字,选好瞄准镜。数实结合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将其蕴含的发展潜能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增长点的重要抓手。各地区要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关键技术,统一低空经济归口管理,完善形成低空经济产业链系统,保障好维护好低空行业健康安全高效发展。如在安全保密的基础上三方信息系统互联,建立全方位通航飞行计划通道;打通军地民解决好飞行器制造、运输、存储方面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等^⑤,通过数字化手段深化在适航审定、飞行活动审批、运营监管、空域管理、安全管控等方面的技术手段革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形成低空经济发展合力。

要打造我国低空经济产业体系中的各类相关技术水平处于创新、前沿状态且产业体系之间协同发展的格局,亟待推动实现现代化低空经济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和协同性。如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且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但一些产业还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以及产业体系之间尚存在“结构失调”“时空失调”等问题,部分领域关键技术和设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受制于人。“根据中国工程院报告,中国26类代表性制造业技术领先5类,技术先进6类,技术差距大10类,技术差距巨大5类。”我国低空经济产业不仅要有发展的“高速”,还要扼住“质”的飞跃这个牛鼻子。要做到这点,必须明确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撑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达到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的,^⑥依托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带来低空经济相关技术的高速腾飞,将会加快实现将我国低空经

济产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美丽图景和远大目标。

三、低空经济发展中的统一战线作为

低空经济作为新时代横空出世的新型战略产业中的全新经济业态,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热点产业。它依托于现代航空技术的迅猛发展,结合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正在改变着我国新兴科技产业领域的图景跃迁。据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已经超过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⑦低空经济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全新增长极,一端牵着先进制造业,一端连着数字经济、新消费业态,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抢占先机做好积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了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线路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新征程指明了奋斗方向。而我国目前正处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突破“李·约瑟”之谜,利用新型中国举国体制完成新质生产力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也要在未来产业、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上(包含在低空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统一战线具有推动新质生产力和低空经济发展的积极反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生产力质态的,又是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等要素的整体综合调适,以此逻辑分析,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是经济领域,但与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相关领域联系紧密。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落实到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低空经济涵盖广泛的产业链涉及政策制定、应用场景拓展以及产业链各环节的高效协同。”由此可见,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锚定新质文明前景,准确把握因新质生产力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变动,聚焦新时代条件下凝聚统战向心力、画好最大同心圆的目标遵循,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未来性维度。新质生产力所具有的“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⑧的思维特性对社会关系的调适形成了关照。伴随着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因而,统一战线主要能够为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完善提

供积极的反作用^[7],二统一战线部门联系和团结的工作对象范围主要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等十一类,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领这十一类群体人员中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精英力量,发挥其智力密集等优势,使他们完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低空经济领域)的参与者、实践者、主力军,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具体做法可以包括:首先,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培育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其次,“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9]健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营造具有全国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依托统战优势力量在世界范围内高效引入优质资本、关键资源、先进技术、拔尖人才,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与创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聚力我国新兴战略产业、未来产业、前沿产业由“跟随者”实现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近年来,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23年9月,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3年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到275.78亿元,比2022年增加12.11亿元。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14家企业的关键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432家企业通过自筹资金完成科技成果转化。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10]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在加快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尤其是可以大有作为。

统一战线作为我党的重要法宝,一直以来在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自然也要发挥支撑力、推动力。面对低空经济这一新兴领域,统一战

线完全有必要有条件有能力聚焦新征程、贯彻新理念、转换新动能,抓住与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和丰富统一战线助力新质生产力(包括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未来通道建设。

在低空经济领域,统一战线应当关注低空经济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低空经济涉及航空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多个方面,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和发展潜力,借助非公经济板块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涌现理所当然。要依靠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中高级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力量,做好研发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统一战线要在低空经济领域政策调控与完善方面发挥作用。要鼓励民主党派、工商联通过直通车、调研报告、专家建言、党派提案等多种形式推动低空经济产业落地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解决制约和束缚其健康快速发展中政策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加强上下协调沟通,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确保低空经济领域产业政策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高效满足市场需求。如民革中央今年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提案》;民盟山东省日照市委员会确定“低空经济发展”为2024年主委领衔调研课题,统筹“内脑”“外脑”资源,深入调研,力求形成有质量、有价值、有见地的高水平参政成果就是支持低空经济稳妥高效发展的有意义的尝试。要鼓励他们继续围绕低空经济从政府侧、行业侧、平台侧、企业侧、生态侧等不同角度出发向统战部门报送民意信息和调研报告。

统一战线要引导统战成员开展低空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专项研究和重点专题调研。可以围绕低空经济产业等关键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与传感器、主控芯片等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高科技新兴产业组织开展专项调研,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详实准确的数据分析研究等支撑材料,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统一战线要注重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养和引进。低空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需要数量庞大的高精尖人才队伍支撑。因此,统一战线(下转第51页)

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的“大一统”理念

王雄刚

【摘要】作为一种原生性的、自成体系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既绵延不绝,又不断开拓创新,其历史演进彰显出鲜明的“大一统”理念,呈现为多元一体文明的源起、华夏共同体演进中“大一统”理念的孕育、东周秦汉“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大一统”制度实践及发展、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中华现代文明的开创几个大的形态。基于“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的贯通,中华文明在保持其内核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底蕴,在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保持基本特质。依据这一演进逻辑,探析中华文明的走向,尽管在晚清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特定年代还呈现出一些“西化”的样态,但并未消沉,反而在冲击下重拾机遇,在革故鼎新中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华文明 历史演进 “大一统”理念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人对其文明的辉煌成就和独特性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以此为基础,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文明形态组成、且有时相互竞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世界五大原生性的第一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且未曾中断的文明,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1]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同步共进,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为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2]有鉴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探析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的“大一统”理念,一方面,可回应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见;另一方面,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动能支撑,希冀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效用。

一、多元一体文明的源起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或差异性会影响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3]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了,亨廷顿的观点不尽全然,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注入的无疑是和平与发展的动能。

实质上,人类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观点是18世纪由法国思想家率先提出来的,起初,“文明”与“野蛮”相对,暗含有西方文明一元论的倾向。后来随着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多元文明成为普遍的共识。探析文明起源一元抑或多元,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则,文明起源的内涵是一元的,世界各地的文明均起源于婚姻形态的变革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二则,文明起源在地域上是多元的,世界几大古老的文明区几乎均是在同一时期由野蛮转向文明。^[4]探究中华文明的演进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4年专项课题(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陇东南始祖文化传承创新研究”(GSSYYB2024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大一统的历史演变、制度构建及其治理实践研究”(23&ZD234)。

作者简介:王雄刚,男,博士,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过程,呈现出一元之中有多元、多元融合为一元的鲜明形态。

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考古证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并产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技术得以在各区域间传播,为境内各地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5000年前左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华大地星罗棋布着文明的雏形,比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彼时,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各地域文明经过交流、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5]具体而言,从黑龙江北部到云南西南部,再到东部沿海地区,早期人类的活动分布广泛。他们使用石器,以狩猎、采集为生。随着后期人口的增长,人们逐渐尝试农业生产。为了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逐渐发展出了各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公元前5000年,水稻逐渐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食物。同一时代,粟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得到种植,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大麦和小麦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中国,同粟一道成为北方的主要食粮。^[6]这一时期,散落的族群在各自聚居的区域形成了集团,从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分散聚居的先民分别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7]这构成中华文明格局中的多元起点。

上古文明的多元格局中,不同地域文化在交往中出现了融合与竞争,使早期多元文化从“满天星斗”逐渐变为“月朗星稀”,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雏形。从早期散布全国各地的文化遗存看,各文化遗存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各地区文化发展速度不平衡,相比较而言,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发展水平较高、速度较快。^[8]后来随着诸种因素的共同叠加,使得黄河中下游逐渐成为中华文明汇聚和发展延续的中心。黄河中游的文化类型和黄河下游的文化类型,以及长江下游的文化类型,在交往、交流中相互渗入。这一过程中,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渐演变为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特性也部分地汇入龙山文化中,融合成为具有共同特质的早期中华文明,即在多元之上叠加为一体。

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步形成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类作物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下,人口平稳增长,城邑逐渐在中原地区兴建起来。此时期涌现出了具有地区统治地位的城址和大型聚落,反映了五帝时代万邦林立的状况。从邦国型文明向夏商周王朝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族群组成部落联盟,且联盟之间时有战争。战争加剧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加速了阶级分化,产生了世袭制的夏王朝,历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从文明萌发到王朝文明出现,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阐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概而论之,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多层次“一体”文化格局。8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业已孕育而出,6000年前左右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事实上,“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大一统”的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9]这种“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缘起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与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大体一致。

二、华夏共同体演进中“大一统”理念的孕育

中国传统政治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元体制,即整个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政权始终维持着一元中心的地位。探析早期的国家形态,在距今约3000年的上古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统一、强大,且至高无上的君主政权,^[10]这深刻影响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

夏商周上承五帝时代,下启秦汉王朝,是中华早期文明转向兴盛的关键时期,“天下一家”为各族群普遍接受,华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确立。文献资料揭示,华夏民族的起源有主源和支源之分:主源有炎黄、东夷;支源有苗蛮、百越和戎狄等。^[11]大约公元前2200年,夏人在黄河中游的河、洛流域黄土地带率先崛起,夏王朝的壮大与青铜器的使用密切相关,青铜器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之中,反映了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基础的形成。

夏王朝扩展中,与处于东方的“夷”进行战争,最

终占据优势。二里头遗址反映了夏文明的特质,是迄今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等,展现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大致相符,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里头文化圈”。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和礼制向四周传播,彰显了“九州攸同”的发展趋势,说明夏文化逐步被周围部族所接受,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断对周边产生强辐射。

继夏而起的商人部分继承了东夷人的文化,在夏商之争中获胜,建立了商王朝。后来位于黄河中游西部的周人兴起,继承了商的天下。可以说,东部与西部的政治对峙成为夏商周三代历史演进的推动力。从夏代开始到商周,三个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基地,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即中原。从“中原”两个字可以意识到,这一区域就是中国的中心。^[12]

夏商西周历时约13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从文献资料和文物考据来看,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威武雄壮的上古史。夏商西周三代虽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在文化上的共性则是主要的。西周时期,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文明国家形态,在族群发展上形成了华夏族,并在文化上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本特质:在国家政治合法性上奉行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在国家政治体制上奉行家国同构、天下一体;在族群构成上讲究“华夷一家”的文化共同体。

(一)敬德保民、天德合一

夏商周三代穿越千年而意蕴深远,开启了天命与王权的联姻,“君受天命”实现了政权的合法性保障。王权被笼罩在天命的光环下,具有神圣的权威,为世俗政权的正当性辩护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质是试图以道德治国,将天子作为道德的化身,同时又用道德礼教来约束天子和臣民。^[13]“天命观”在西周时期已然成熟,这一范畴勾连了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为统治确立了责任、义务的原则。^[14]

事实上,在王权产生之初,就与先民的神灵信仰结合在了一起,垄断了对神意的解释,成为维护王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人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世间万物的一切被覆盖在天之

下。这样对“天”的直观认识,使得“天下”万物都反映并且服从“天”的意志。之后随着“天”和祖先神的结合,“天子”思想逐渐产生,即人间的统治者是与“天”有关联的“天子”,代表着“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商代是“天子”思想的萌芽期,周人在继承商人“天子”观念的同时,认识到“天命靡常”,所以周人突破性地将以“德”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准。另外,通过商周革命,周人也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体会到民心向背可以决定王朝的兴衰。于是在政治理论上,周代相比商代有了较大的突破,形成了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的思想。总而言之,在政治合法性的阐释上,中国人没有诉诸神权,而是在部分摆脱血缘束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德行”治理模式。

(二)宗法礼制、天下观念

君主的权力和尊严,除了在舆论上进行“神化”之外,更有其现实的统治基础,即宗法社会的等级关系。^[15]探析周王朝宗法礼制的本质,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国家权力,并以具有等级制的礼乐制度作为外在体现。宗法制主要处理的是姬姓家族内部的关系,周天子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是所有姬姓的宗主。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则分封到各地为诸侯,各诸侯也以此类推,从而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结构。显然,宗法制的权力分配展开就是分封制,在分封制实施过程中,除了姬姓的诸侯,也有不少异姓诸侯。通过分封制,西周形成了以姬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共同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格局。

表面上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除了君臣政治关系外,其他似乎是家庭伦理关系。实则不然,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凸显为伦理政治,国和家是相通的,“国家”乃“国”与“家”的融合体,^[16]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

礼乐制度是家国同构的外化,《周礼》规定天子可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到了东周,天子权力式微,各诸侯开始出现礼制上的僭越,礼乐制度的崩坏是周代金字塔式“家国同构”政治体制解体的反映。后来周朝的政治体制渐趋瓦解,但“家国一体”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孝-忠”这一价值观延续了下来,尤其是经过儒家的阐发,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义。

(三)要在中央、华夷一家

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基础是“大一统”,凸显华夏文明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并维护作为“上天之子”皇帝的神圣威权。在“大一统”秩序中,天子是权力的核心,地方大权归于中央,中央之权则集于君王。^[17]展开而言,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近代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然而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8]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成熟,逐渐形成了以“礼”作为标准,来区别“华夏”与“夷狄”的早期族群思想,作为方位概念产生的“中国”开始与“华夏”相融合,发展成为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意义的政治共同体概念。

“中国”顾名思义为天下之中,即周天子所居之王畿和直接统治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所指代的范围逐步拓展,用来指称“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经常与“四夷”相对使用。事实上,从空间方位概念转变成民族共同体的范畴,“中土”逐渐代表具有族群指向、更强调血缘的“华夏”。晚周已降,“中国”一词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衍生出文化中心的内涵。通过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的联姻,“华夏”共同体不断扩大,“中国”的范畴随之扩大。这一过程,将原初具有血缘意义的华夏转化为一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华夏,使得华夏或者说“中国”成为一个政治、文化上的多族群构成的共同体。“中国”扩大过程鲜明展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称“中国”。随着周边地区被悉数囊括进“中国”,“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战国时,“中国”已然成为列国全境的称谓。

三、东周秦汉“大一统”理念的形成

到了西周晚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已然成为普遍共识。^[19]周朝初期,通过军事扩张和文化融合,周王室逐渐将周边多族群纳入治下,形成了覆盖广泛民族的统治网络。彼时,周朝的版图从长江南部扩展到长城以北,东至山东南部,西至秦岭南北。事实上,周朝以华夏族为核心,不断向四周扩散,又不断融合,而熔铸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这通过“同心圆”方式的扩散,实现了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管理和文化整合,为“大一统”理念的孕育提供了丰厚土壤。

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封建分裂趋

向明显,与此同时,诸侯争霸推动了地方力量的崛起。“封建”体制趋于崩溃,周王室的地位和诸侯国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也开启了重新统一、建立新秩序的诉求,并且封建宗法制的解体为君主集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到战国时期,地方诸侯国如魏、秦、楚等通过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改革,逐步转变为拥有高度集权的国家。特别是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实现了较为深入的中央集权化改革,郡县制的推行,不仅加强了国家的管理效率,也为后续的统一进程奠定了基础。思想观念层面,诸子百家争鸣,尽管各自治国理政的具体策略不一,但都反映了对新的国家蓝图的构想。总体而言,周秦之变使得宗法分封制逐步过渡到中央集权,为“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战国七雄互相争战的后期,秦国的优势特别是军事上优势越来越明显。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即秦朝。秦始皇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将“大一统”制度较为深入地付诸实践,通过推行郡县制来替代封建制,从根本上消除了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使得“大一统”理念得以贯彻至基层。为加强边疆地区的联系,秦朝大力修筑交通基础设施。从首都咸阳出发,修建诸多驿道,包括一条直通北方的官道“秦直道”,从咸阳经过云阳、上郡直至九原。与此同时,为强化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秦朝征发劳力在西南地区修建“五尺道”,连接中原与云、贵、川等地区。这一切显著增强了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夷族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包括文化礼仪的标准化和度量衡的统一,不仅规范了交易规则,减少了市场交易中的摩擦,也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支撑,加深了“大一统”理念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根基。

汉承秦制,在汉高祖及其后“文景之治”积累的强大国力基础上,汉武帝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秦制为汉代继承后,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成为主导性思想意识。事实上,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并非仅为《论语》,还有《春秋》。董仲舒极为推崇《春秋公羊传》,将其中的“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形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大一统”的基本要素:空间疆域上的统一,时间上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式的转换,以及帝王德行的保有。具体而言:哲学

上讲求天人感应,政治上强调中央集权,制度上推行文官制度,伦理上则是三纲五常。^[20]“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不断丰富,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土壤。通过对秦制的承续,汉朝形成了一套基于“大一统”思想的多族群政治格局,大致有三层:内层是传统“华夏”之地;中层是其他族群聚集地区;外层则是以朝贡方式维系的其他部族集团。通过这一政治格局,稳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

秦汉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有力推动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通过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治理体系的推行,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的确立,构筑起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基调。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将各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机构将周边匈奴、西域诸部、百越、西南夷等纳入大一统体系。这一切奠定了两千余年统一王朝的基本法度,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

东周秦汉时期,“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及制度实践不仅标志着中国地理上的统一,更深层次体现了政治、文化与法治的全方位整合。从周朝的多民族融合、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到秦汉的大一统制度实践,这一切见证了由地方分裂走向中央集权统一的历史进程,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内在整合力和对统一的坚定追求。一系列历史变革不仅为后续数千年中国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也为“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的理论阐释提供了深刻的政治文化基础,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四、“大一统”制度实践及发展

周秦之变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然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也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是呈现出二者的融合,具体而言:1.治理规范方面,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重新焕发生机,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2.官僚体制方面,秦代三公九卿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其间制度设计上虽多有变革,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君主权威不断强化;3.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方面,虽然秦汉以后郡县制日益占据

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4.政权基础方面,经过宗法与政治的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鉴于此,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并非“百代皆秦政”,而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融合。^[21]

秦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其间呈现出长时段的族群大融合景象,“中华化”成为历史主流。伴随着族群的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了中国化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与分裂并未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

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重建了“天下共主”政治秩序,“大一统”特征凸显。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和南朝的“礼乐”。唐贞观年间,大破突厥,原属突厥控制的诸多部族归附唐朝,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统御北方游牧民族。“天可汗”的多元领袖身份,是统治管理多民族国家当中创设的一种新制度。

唐代后,经历五代十国的分裂,北宋完成了中原的局部统一。整个辽宋金时期,是中原政权和辽、西夏、金政权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对峙和更迭。辽首次以非汉人统治者的政权,同时管辖部分传统汉人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管理体制,这种二元治理方式为中央管理不同族群聚居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宋元时期,对西方而言,是中世纪的后期。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华文明在挑战中绵延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文明进一步向外延伸,面对其他文明的挑战,冲突与融合并存。^[22]具体到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原恢复了统一,然而它的力量比较微弱,北方的辽、金,西北的西夏、西州回纥,西南的大理、吐蕃诸部,均已壮大,并吸收了中原农耕文明区的大量知识和治国理政经验,这致使当时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将“长城-腾冲线”两侧的三大文明区域统一起来。^[23]这一历史使命最终被后起的

蒙元加以承担。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元代版图囊括了游牧、农耕、山林渔猎农牧三大文明区,疆域比盛唐辽阔。元朝建立后,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设置大致沿用了辽、金旧章。^[24]特别是为防止地方分裂,发展出了行省制度。至元九年(1272年),在燕京旧城的基础上,新筑“大都”,元朝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汉地。之后,积极改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恢复科举制,将蒙古政权由草原本位转变为草原本位和农耕本位并重。元顺帝时,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举措,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

1368年,元被明所灭。明取代元,更明确地以农耕文明为本位,采取一系列措施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明代的开国者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打出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于1368年农历正月初四,在应天府登基时所颁布的“祭天诏书”明确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即“自宋运既终。帝命真人(元世祖)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25]之后,明朝以“华夷无间”的开明族群观念,采取以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全面继承元代的疆域治理模式。

在政权组织形态上,元明之间,有继承,亦有发展。^[26]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明初,一方面以宋代积弱为由,取消三省,废除宰相,皇权直接干预和支配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另一方面,明确君臣等级名分,严明号令,以确立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这使得明初可谓“政通人和”,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外患不断。此情势下,张居正实施改革,史称“万历中兴”。但不久,张居正改革举措被废止,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直至灭亡。有明一代,北元政权与明朝相始终,但大一统始终是明王朝的恒定目标,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宗藩体制重新得以恢复。

清代在广泛吸收前代王朝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中央直接有效统治不同区域的多元管理体制。对“龙兴之地”东北地区、西藏和新疆等地采用不同管理方式,以理藩院作为总辖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继承发展了辽、元的制度。另外,清朝皇帝也具有

多元领袖身份,以“中华王朝”正统自居,^[27]强调以“礼仪”别内外而非以“种族”别内外,克服了狭隘的族群观念,回归以“文化”视角理解民族关系的汉唐模式,以中华文明为内核塑造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随着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的认同上升到更高层次。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接受了“中国”的观念,承袭“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行省制度等方式,丰富了国家治理模式。特别是夏夷观念的调整,更呈现为一个“文明共同体”。^[28]从“明承元制”到“清承明制”,六百多年间“大一统”国家建构的实践与完善,在融通农耕与游牧文化、各民族共创中华、不断夯实“多元一体”基础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不断强化着“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记忆,反映了该时段不可撼动的“大一统”政治局势。^[29]三代先后相继,竭力践行着“华夷一家”的“大一统”理念,最终将广阔的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有效统摄起来。这一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汇聚成为多元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大家庭。^[30]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中古后期的发展富有成效。“大一统”思想得到不断地传承推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愈发深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进一步巩固,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也就此奠定。

五、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纵观中华文明和中国自古以来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能够超越时空不断前行,文明能够一直延续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密不可分。事实上,发展到近代前夜的中华文明,其规模和成就仍在继续扩大。尽管传统国家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生命活性和发展潜力等并未削弱。虽然后来中国所遭受的外来冲击,远远超出一个文明体在稳定常态下所能承受和化解的范围,但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演进所积累的诸多优势,仍为近代以来中国能够积极应变、转型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就此得以延续传承。

近代中国,旧有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大一统”维系自救的力量依旧存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华夷一统观”的结合,

使得“中华民族”的概念应运而生。^[31]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遭遇诸多挫折。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迎来了空前的挑战。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华文明何去何从?这困扰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去思考、探寻和开辟中华文明固本开新的路径。

过去很长时间里,学界通常把中国的近代遭遇和现代化进程简单归为“西方冲击”的结果,然而若从历史的长时段审视,就会发现中华文明的诸多内在特质不仅延续到了近现代,更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因。比如,中国浓厚的农耕文明传统以及庞大的农业经济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革命必然要选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近代中国培养和塑造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实干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晚清以来,在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大一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揭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统一传统和历史依据的标识性概念。^[32]事实上,现代中华民族的观念是晚清民国时期萌发并确立的,并且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特别是与西方主义思潮传入后所引发的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相伴而生。^[33]1840年之后,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悲惨遭遇,现实层面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深层次上,使得中华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陷入“文明蒙尘”境地,遭受空前的认知危机。

对中华文明的质疑首先来自西方。18世纪后期尤其是19世纪,西方国家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及海外殖民扩张,国力大为增长,逐渐滋生妄自尊大。西方文明的一元性、排他思维模式也日益显露,开始通过贬低世界其他民族和文明来建构自身的优越感,其间当然也包括对中华文明的贬损,当时的西方学者不断抛出中国“无哲学”“无逻辑”“无发展”等论断,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给中国贴上了“非文明”,甚至“未开化”“蛮族”等标签。

与此相应,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剧,贬损中华文明的说教传入中国,影响到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20世纪初期,“中国落后”“西方文明先进”的观念在国内有一定市场,甚至还有人宣扬

中国“百事不如人”。

所幸的是,西方文明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并未沉沦,而是在革故鼎新的基础上,不断迎难而上。通过学习借鉴外来的有益文明成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复兴和文明赓续注入新的动能。事实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是一个重审古今中西,不断找寻自我、重拾自信的进程。每经历一次波折,中国人更能真切地认清自我。“五四运动”之后,尽管中国人对“未来向何处去”尚未形成共识,但坚持国家、文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已然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关照中国历史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成功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六、中华现代文明的开创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具有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构筑起了其鲜明而独特的主体意识,为中华文明的长期赓续和不断创新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无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4]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主,中华文明迎来了崭新的发展篇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35]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与转型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着力于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出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开启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在此过程中,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中国人愈发深入地思考和探索自

身发展道路的源流与方位。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这为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文明成果不断涌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共同性、增强一体性、深化融合性。在此基础上,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国家统一,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些史无前例、举世罕见的现代化征程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各个方面,全新塑造着中华文明的面貌。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应理解为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绝不限于富国强兵,最终愿景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秩序。^[36]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其实质不是谋求用一种文明取代其他文明,而是给人类文明的百花园培育新生机。实践当中,更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交流互鉴,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进入新时代,人类社会遭遇种种难题,这需要进一步从文明的高度思考当前中国的发展走向。当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什么中国特色?时下,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确定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正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文明关怀和历史贯通意识。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辅相成。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而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滋养中,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沿着自身道路不断推进,也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有鉴于此,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7]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在进一步彰显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更为中华文明的赓续更新确立了新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方法。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相关学理探究的深入,“大一统”理念被重新诠释,“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系统阐发,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大一统”理念的认知。立足当

下,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彰显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既是中华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中华文明连续的结果。^[38]

七、结论与讨论

世界上曾存在过诸多数千年古代文明的国家和民族,遗憾的是,其中不少并未将自身的古代文明传承维系下来,出于种种缘故,他们原有的古代文明早已被不同的文明所取代。值得骄傲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其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从未中断,并且相比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无疑得到了更好的维护、传承和发展。^[39]古往今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滋养了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基于上述文明特性,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与“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紧密相关。“大一统”理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而逐渐完备起来。“大一统”理念的孕育可追溯到上古时代,西周时有了雏形,孔孟时代渐趋成熟,系统阐发则是汉儒在《春秋公羊传》中的释经。董仲舒将“大一统”阐释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根本。此后,“大一统”与“天下观”“正统观”“夷夏之辨”等经典论述渗透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范畴。事实上,“大一统”不仅是一套认知体系,也是付诸实践的行动准则,在中国历代统治合法性的确立、疆域拓展、社会治理、意识形态构造等方面发挥着统摄作用。^[40]近代以后,中国逐渐迈入现代国家行列,然而“大一统”理念所发挥的效用并未消失,则是与输入的西方思想碰撞交融,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建设中的重要滋养。

探析“大一统”理念付诸实践,历代王朝,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导的王朝,抑或以蒙、满等少数民族为主导的王朝,对于“大一统”学说均极为推崇。历代王朝所推崇“大一统”理念中的“忠君”“爱国”等思想,成为广大民众普遍认可的理念,人们无不以生活在“大一统”境域中为荣幸。^[41]因此可以说,“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

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42]

鉴于上述探析,“大一统”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制的王朝,实现了多民族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汉代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成为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事实上,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夷夏之别,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因此,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主要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只要接受“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括而论之,在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大一统”秩序长期延续,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处积淀为“天下”情结。尽管中国历史进程中分合无定,但“大一统”理念却愈加强化,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43]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的历史传统。鉴于此,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须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充分彰显中华“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

参考文献

- [1]姜义华.何谓中国[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1:45.
- [2]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12.
-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7.
- [4]启良.中国文明史(上)[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32.
- [5]李伟,孙任哲.“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理念引领下的治道意识[J].道德与文明,2023(02):92-101.
- [6][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M].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6.
- [7]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4:7.

- [8]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18.
- [9]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60.
- [10]童强.中国政治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9.
- [11]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
- [12]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6.
- [13]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65.
- [14]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M].徐峰,巨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58.
- [15]彭新武.中国古代治国要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91.
- [16]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22.
- [17]彭新武.中国古代治国要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08.
- [18]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 [19]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5.
- [20]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较[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2:110.
- [21]彭新武.“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06):144-154.
- [22]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246.
- [23]姜义华.何谓中国[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1:64.
- [24]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131.
- [25]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235.
- [26]朱永嘉.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0.
- [27]李金飞.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M].河北学

刊,2024(01):53-59.

[28]干春松.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162.

[29]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223.

[30]田澍.承前启后:明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J】.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06):50-55.

[31]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05):14-18.

[32]晁天义.“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48-67.

[3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79.

[34]宇文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2):5-11.

[35]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314.

[36]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218.

[37]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中国军转民,2022(17):8-9.

[3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

[39]杨建新.中国少数民族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5.

[40]杨念群.“大一统”观的演化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03):1-14.

[41]晁福林.“大一统”学说的构建与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的观念认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19-29.

[4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

责任编辑:卢婉春

(上接第41页)

应当积极为非公企业搭建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平台,创造吸引人才的条件,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投身企业于低空经济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要引导各党派、工商联、新联会等党派团体举办培训、论坛、研讨会等活动,提高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9]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EB/OL】. 光明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235671695711123&wfr=spider&for=pc>.

[2]本刊编辑部.延链条 聚集群 创场景--低空经济领飞新赛道【J】.产城,2024(3):10-12.

[3][4]尹西明,陈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路径【M】.河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12;79-98.

[5]艾丽格玛.争夺低空经济先手优势,看各地2024年如何谋划【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4(3):47-52.

[6]徐豪.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J】.中国报道,2024(4):20-21.

[7]王恺强,薛蒙蒙.民革中央建言低空经济发展,让“低空经济”飞得更稳、更远、更高【EB/OL】.民革中央网站,<http://www.ming.gov.cn/n1/2024/0318/c415581-40197861.html>.

[8]徐敏,汪语桐,刘靖北.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效能提升与图景拓展【EB/OL】.统一战线学研究,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1150.002>.

[10]柴洁,王晓涛,潘晓娟.民营经济向“新”而动“参天大树”更加“枝繁叶茂”【N】.中国经济导报,2024-3-19.

责任编辑:马霞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孙正林

【摘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就需要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使之贯穿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关键词】中华民族历史观 “大一统”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

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把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他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2019年,他用“四个共同”阐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涵,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2021年,他第一次提出了“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同时提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要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解决、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四对关系”,正式把这一重要思想明确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必须”;2023年在中央

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年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作出的重要论断,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大问题,对于增强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坚定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由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来的。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词典中是没有“民族”和“中华民族”这个词语和概念的。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真正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民族意识,从而走向民族自觉。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

作者简介:孙正林,男,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处三级调研员。

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

根据对古人类化石和古DNA的研究,早期的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其中有一支在五六万年前进入了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之后沿着中南半岛继续向北迁徙。在向北迁徙的过程中发生了分支,有一支沿着海岸线迁徙到了我国的两广江浙一带的丘陵地区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古代的百越人;而另外一支经过云南、缅甸进入我国西南的云、贵、川一带,形成后来的百濮人。这些百濮人后来也分裂成2支,其中的一支沿长江而下,迁徙到长江中游的湘鄂川黔一带,形成了历史上的南蛮和三苗的一部分;另外一支百濮人则沿内陆北迁至今天甘肃、青海的祁连山、焉支山到昆仑山之间的草原一带,与当地土著人融合后形成了一支规模十分庞大的民族,叫做古羌族。大约在5000年前,古羌族的一支西迁进入青藏高原,在和当地的土著民族不断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藏族的先民吐蕃人。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古羌人的另一支向东迁徙,来到了黄河中游的渭河流域一带,生活方式也逐渐从农牧过渡到农耕生活。其中有两支比较大的部落,分别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后来黄帝部落通过阪泉之战打败了炎帝部落,这两大部落就逐渐融合成了炎黄部落联盟。炎黄部落联盟是华夏部落联盟的前身。大约4600年前,炎黄集团战胜通过涿鹿之战战胜并吞并了东夷集团,形成了华夏部落联盟,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后又经历三皇五帝、夏、商,到了周建立后,周人认为自己是夏的后人,为了和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区别,周人以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为族称,史称华夏。周人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即四夷或四裔。“华夏”和“四夷”,并不是互不相干的独立体,彼此不但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且“华夏”和“四夷”互相之间由于地域相连,不断地相互吸收和交融,因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

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

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这一民族实体里,各族同胞已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所有成员都已具有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多元一体”,所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所谓“一体”,是指56个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3]总书记也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融合。第一次大融合起始于东周时期的春秋战国,终结于秦始皇统一六国。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4]周建立以后,凭借着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一系列天下共主的社会制度以及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维持另外275年。可是,随着分封出去的诸侯跟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以前靠血缘关系维持天下共主的局面难以维持。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势力较强的诸侯国不满足于自己分封时的爵位和土地,开始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和原先制定的礼仪制度。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诸侯群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各国的兼并与争霸客观上也促进了各地区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这一时期融合的结果就是使“四夷”等少数民族融入了华夏文明,初步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四夷距边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这次融合的不仅标志着华夏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基本奠定了后来的华夏文明圈。为秦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统治者在经济上通过各种

政策促进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在文化上宣扬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大一统思想,同时又对各民族的文化兼容并蓄,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并逐渐壮大,从族源上讲,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经历四百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

第二次融合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入华时期。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西晋的灭亡同时也促生了两个重要民族融合趋势。一是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占据中原。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等五个少数民族,史称“五胡”,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这些游牧民族通过入主中原,接受到了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不断地吸收先进的汉族的文化习俗,大大地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二是永嘉之乱导致衣冠南渡。大规模的汉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百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衣冠南渡,大量的土族和汉民被迫南迁,与东南地区的东瓯、扬瓯、百越及西南地区的苗族、蛮族等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南方地区因此得到迅速开发并日趋繁荣,这大大加速了汉族和南方百越民族的融合。

北魏之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已经基本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尤其是北魏孝文帝大力全面推行汉化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大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隋唐时期,隋唐王朝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了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

第三次民族融合是发生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

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各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是清代。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线,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底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形。但是,清朝虽然集中了历代大一统的经验,但并未革除历代王朝的弊病,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王朝的历史周期律。当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迈入近代门槛,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帝国殖民的浪潮。“天朝上国”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陡然跌入历史深渊,由此进入历史上备受欺凌、最为孱弱的时期,同时也步入走向觉醒、奋起抗争的转型时代。

从中华民族民族融合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从自在民族实体到自觉民族实体的历史。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

格局。”^[5]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

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是互动性的特点。不同部族、民族之间的频繁互动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中国历史上存在众多部族、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它们互动频繁、迁徙不息。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各部族、各民族就一直处于不断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中。在互动和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在文化上取长补短,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在婚姻上互相通婚,生活习俗的差异也逐渐弥合,血缘逐步融为一体。多次民族迁徙和融合的结果是一方面是加速了全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融合,南方少数民族与南迁的中原汉人融合,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每一次民族大互动、大融合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每一次大融合之后,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促进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互补性的特点。互补性即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互补。我国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居住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适应各自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样式。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和盆地几乎是汉族的聚居区,汉族从事的是农业生产,是农耕经济模式。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畜牧业生产,属于游牧经济模式。居住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各民族之间,需要交流和交往,需要相互合作和互通有无。数千年来,各民族在经济上互补、技术上互帮、困难时互援,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北方与南方、中原与边疆、农业与牧业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三是包容性的特点。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不断互动、迁徙和交融,与各民族的包容性密切相关。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展现出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认为汉

族和少数民族是一体或一家。如唐太宗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强调华夷一体,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没有偏见。明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也强调华夷无间。清朝皇帝的华夷一统观念更为明确,强调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二是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历史上有些民族甚至主动“全盘汉化”,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鼓励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尊崇儒学,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三是不排斥国外文化和宗教。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特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传入我国后,都能与中华文化相融。

四是统一性的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各民族的互动和融合中得以形成,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和发展,是与古代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的。古代中国人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人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促成了古代中国整体性地理概念,各民族都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种地理概念进而促成古代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均把祖国统一作为重要目标,以江山分裂为忧,在分治中谋求统一,在统一中谋求长治久安。在这种大一统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认同意识越来越强。

四、“大一统”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史、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发展史、一部致力于“大一统”又尊重民族文化差异的中华政治文明形成的发展史,这是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根基。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统一政权和地方性政权,其中由汉族以外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在少数。民族政权因其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形成与汉族统治王朝不同的

特点,无疑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政权之间长期、紧密的互动和联系,不仅使得“大一统”的外延不断扩大,统一规模和深度得以伸展,也使得“大一统”的观念内涵和治理方式更为丰富,进一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中国历史上多元互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局部统一造成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扩大,以及“大一统”在范围与观念上的扩展,共同推动了从局部统一走向大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有分有合,最终的趋势是统一。

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史也证明,“大一统”的过程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大一统”是中国人的历史信仰,中国人自古崇信“大一统”,“大一统”构成了中华文化核心理念,“大一统”思想的基石是强大的文化认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

孔子提出“华夷之辨”,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为儒家所尊崇,在民族文化思想上确立了华夏的正统地位。孟子则提出“用夏变夷”,强调以华夏文化影响改变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明成祖朱棣在给瓦剌的诏书中明确提出了“华夷一家”的观念:“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从秦汉时期的“华夷之辨”,到明清时“华夷一家”已成为大一统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一统”的文化认同贯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魏晋以后,“五胡”势力陆续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先秦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包括天命、华夏、中原、“大一统”、华夏文化等综合因素的正统观,遂成为其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北魏孝文帝认为是黄帝的后裔而改汉姓为“元”,还是胡夏自认为是夏启的后裔而建立大夏政权,亦或是苻坚的“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这些客观上反映出“入主中原的北方诸族归属华夏一统的向往和主观认同”。辽、金自称“中国”,使“中国”一词的含义扩大到其统治的广大东北和西北地区,不再局限于长城以南。而两朝对于华夷同风、华夷无间思想的推行,则进一步加深

了各民族对“大一统”的认同。元世祖忽必烈秉承大一统思想,依据《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表明自身继承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正统地位。明清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明朝诸帝反复强调“华夷一家”,明太祖朱元璋称“朕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清朝统治者明确其“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的原则,发挥“华夷一家”理论,扩展“大一统”之内涵,以此构建自己的王朝合法性。这些都是“大一统”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没有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可能争先恐后自视为中华正统。

正是各民族在“大一统”治理目标下,不断扩大和巩固统一的政治与治理格局,使得中国历史长期连续发展的进程,形成了“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趋向,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

五、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000年文明史铸就的民族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演进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8]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的就新时代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做出的最新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正确把握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9]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为进一步做好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我们要重点处理和把握好总书记所强调的四个关系。

第一,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其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增进共同性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方向和重要原则。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在这个大家庭中,56个民族就是56个家庭成员,每个民族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要看到,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民族间的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多,社会一体化和整合性程度不断提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二,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族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其特定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强调尊重差异是为了包容多样,但不能强化或固化差异,不能用差异性消减或取代共同性。其三,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9]强调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就是既要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又要着力增进共性、促进一体,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

同体。^[10]实践也充分证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只有各民族相亲相爱、彼此尊重、团结奋斗,才能共同创造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才能形成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共同繁荣、共享成果的生动局面。

第二,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首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政治归属感,是在对各民族意识有效规制基础上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意识,是公民个体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具体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其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具体利益的一致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具体利益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两者辩证统一。一方面,各民族始终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充分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百业凋敝,人民遭殃。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最高利益,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始终要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推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具体利益。

第三,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首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国家。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

梦想精神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其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主干”与“枝叶”的关系。一方面,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是并育不悖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正所谓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另一方面,繁荣和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推进。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这里强调的“文化认同”是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能片面地把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不能用“枝叶”代替“主干”,不能本末倒置。

第四,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1]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不断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要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具有更强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1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8-29(1).
- [2][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72.
- [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
- [5][1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30(1).
- [6]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5-29(2).
- [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出版社,2017-10-18.
- [8]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出版社,2022-10-17.
- [9][10]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9-27(1).

责任编辑:王昊

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

王怀诗

【文 摘】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是一项亟待重视的系统工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数据挖掘及信息系统开发等方法,对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即裕固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文化资源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以现代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等作为支撑,构建了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基本框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以达到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为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 甘肃省 少数民族 文化资源 数据库建设

一、引言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民族融合程度的加深,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流失风险,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显得刻不容缓。建设完善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以数字化形式存储起来,是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

民族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服务文化等方面兼容博采的产物,涉及该民族的发展历史、语言、文字、生活习俗、饮食、服饰、民谣、民族舞蹈以及各种传说和故事等。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对于推动甘肃省文化强省战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实现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

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包括: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裕固族、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族,以及聚居在积石山的保安族。其中,只有裕固族同时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东乡族和保安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

文化只能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调研发现,这3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存在形式主要是县志馆藏文献资料、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图片资料、音视频资料、民俗记忆等。由于人员、经费、分编等方面的问题,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建设和利用,许多民俗记忆更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消失。

因此,通过对这3个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并有针对性地转换成现代数字资源,并存储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中,这样既便于人们快速有效地查阅和研究,也最终起到保护他们特色文化资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二、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的收集整理

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是一项需要文化资源数据和系统平台共同支撑的系统工程。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首先需要文化资源数据的收集整理,其次才是基于文化资源数据的系统平台的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的收集整理,关系到所创建的数据库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其中,收集整理的文化资源是否具有丰富性和代表性,关系到数据库能否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各种文化资源之间是否满足多样性和平衡性,关系到数据库能否反映一个民族

作者简介:王怀诗,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民盟甘肃省第十三届、十四届教育工委副主任,民盟兰州大学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政协智库专家。

的文化轨迹。文化资源收集整理范围、内容、方法和质量等因素,直接关系到数据库的使用价值,是创建数据库最为基础的部分。

在收集整理文化资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进行主题和范围选择,这些资料一般都具有常规性和官方性,记载的是该民族的大事记和发展史。其次,要实地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民谣和民族舞蹈等。最后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民族的口述记忆和口碑传说,这些对研究民族文化、汇聚文化资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民族文献

民族文献主要包括保存在县志办公室或档案室,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等。前者是民族文化资源的主体,它们多是从官方角度记载民族历史、民族变迁或其他重大事件的文献,相当于一部民族的史书。这些文献尽管容易获取,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分编处理,因此如何进行整理并转换为真正的数字资源,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此外,民间也会有一些文献,甚至比官方资料更有特定的研究价值。马世仁在《甘肃三个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考察记》一文中说道,“我在青海考察时,有一个当地的文物收藏者还收集了不少保安营文书,自以奇货可居,而不公诸于众。”这部分文献通常被收藏者视为自己的“传家宝”,很少允许他人查阅。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加大文化资源保护宣传的力度,让拥有者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建设的重要性,主动进行资源共享或者交由官方妥善保存,从而最大限度地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资源。

(二)民族文物

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创造出的杰出艺术作品,这些作品的加工方法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人们遗忘,而能够保留下来的就被视为珍贵文物。对少数民族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和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博物馆进行考察,将博物馆中保存的关于保安族、裕固族和东乡族的文物进行整理;二是在少数民族旅游景区的文物专卖店等地进行考察,收集博物馆中没有收藏的文物;三是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考察当地人家藏文物情况。

文化资源数据库对民族文物的保护,主要针对的是文物的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应尽量采用现代媒体技术详细记载其制作工艺。例如,可以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制作保安腰刀,将制作流程以多媒体等形式记录下来,配以专业的录音解说,然后将完整资料保存在文化资源数据库中。对于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文物,可由文物的主人做详细介绍;对于散落在民间未被意识到价值的“文物”,需要政府派专人进行鉴别,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寓所。甘肃省特有的3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随着文化融合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说汉语,会讲本民族语言的人在逐步减少。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除了开辟电视方言节目等形式外,还可以通过创建少数民族方言子数据库来实现。对于裕固族来说,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只需要将每个字的发音标注起来,存储在语言数据库中即可;而对于东乡族和保安族,他们只有语言,这种情况只能将汉字作为他们的文字,在汉字上分别标注东乡族和保安族的读音。

(四)民族特色文化

民族特色文化主要包括民俗、民谣、服饰、民族舞蹈、饮食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民俗和饮食文化体现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常常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甘肃省特有的3个少数民族中,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保安族和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不同的信仰使不同的民族在生活习惯和饮食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同样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举办节日、婚丧嫁娶等也有自己的特点。对于民俗文化资源,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文本分析和历史文献追踪等方法收集整理,用文字或多媒体等形式加以描述并记录在民族资源数据库中。需要指出的是,在记录民族风俗习惯时,应当对每一个风俗的来历、演变和发展进行详细介绍,尤其要注重各民族细微而重要的差异以及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的改变。

饮食、民族歌舞和服饰等也都是一个民族比较

有特色的文化构成。应针对不同的文化产品差异与特点,建设不同的数据库子系统。例如,民族歌舞数据库,主要以音频视频资料为主,而服饰数据库主要以图片资料为主,并附以文字或多媒体展示和说明。

(五)口述记忆与传说

每个民族都有对自己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故事传说。例如,汉族的除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节日起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它对汉族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样,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口述记忆与历史传说,这些对他们民族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于口述记忆和口碑传说,需要人们去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进行实地考察,同当地居民深入交流,据此获取有代表性、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并进行详细记载,通过校对、考证等工作进行整理发掘,然后存储在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对应子库中。

需要注意的是,在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的过程中,应当尊重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禁忌等;同时要尽力克服语言障碍,组建由各民族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收集整理。

三、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开发

通过对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系统收集整理,即可着手开发相应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开发文化资源数据库主要的步骤和内容包括:

(一)数据库分析

数据库分析是对数据库类型、用户特点、数据库定位以及元数据内容等方面的研判,这是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和物理结构设计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用户分析。系统分析文化资源数据库的用户类型、特征、用户需求及使用规律等。二是数据库定位。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应属于共享型数据库,目的是促进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研究与开发。三是元数据内容。文化资源数据库中的元数据主要是对上述5类文化资源,采用多种记录与呈现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and 存储。元数据的处理不仅要全面和系统,更要有代表性和特色。因此,需要对元数据进行分门别类,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以体现各种文化资源要素的差异性,并注意各要素的集成与融合。

(二)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的设计分为逻辑结构设计和物理结构设计两个部分,前者是对文化资源的形式抽象,需要确定数据库子库的组成,同时定义元数据的数据项;后者是指文献资源的存储方式。根据前面的分析,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子库目前至少可以分为:文献资源库、民风民俗资源库、口述记忆与传说资源库、民族语言资源库、饮食文化资源库、民族服饰资源库、民族音频视频资源库等7个子库。对于不同的子库可以采取不同的数据存储方式,如文献资源库中的数据可以采取PDF格式,民族音频视频资源库的数据可以采取流媒体等格式,对于民族服饰、饮食、民谣等还可以采取实物呈现或AR技术等。

(三)数据库实施

数据库实施是将数据库设计阶段所设计的数据库,根据其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进行创建的过程。首先,利用数据定义语言定义数据库的三级模式结构,包括外模式、概念模式和内模式。使用这样的模式结构可以提高对数据库的组织效率,强化对数据的管理控制,提高数据库的逻辑独立性和物理独立性。其次,以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作为支撑,用数据操控语言对数据进行操作,即对数据进行追加、删除、更新、查询等。最后,把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设计的结果转化为程序语句,经DBMS编译处理和运行后,从而建立起实际的数据库。

(四)数据库运行和维护

数据库运行包括预测试和正式运行两个阶段。通过对数据库运行的预测试,可以检验出数据库的各项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数据库的操作是否符合相关指标等。如果得出的结果和设计标准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就应该重新对数据库物理结构甚至逻辑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如果数据库的运行测试符合需要,就进入到数据库的正式运行和维护阶段。数据库的运行和维护对于数据库系统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数据库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对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更新,对数据库操作平台进行维护,以保证用户对数据库的高效使用。

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成,并不意味着数据库建设工作的结束。因为随着用户

对数据库的使用,可能会出现一些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比如,有些文化资源被忽略没有载入数据库、已经载入数据库中的文化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够准确、有的民风民俗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等,此外,数据库在运行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各种故障,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对数据库中的数据重新处理,对数据库系统不断更新维护。

四、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的保障措施

目前,国家和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数字产业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突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因此,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有其现实意义,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政府和多方力量的支持与合作

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还不成熟,数据库的种类及内容也不齐全,特色不突出。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单纯依靠地方文化机构是无力承担、无法完成的。应当建立长效机制,争取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合作。相关的管理机构、技术开发人员、当地民众等应通力合作,形成一个集研究、开发、完善与推广为一体的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体系。

(二)做好技术上的科学规划与持续推进

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涉及计算机、网络通信、多媒体与大数据等多种技术。因此,必须做好技术上的全面规划,建立先进、安全、开放、特色的文化资源数据库,避免出现重复性、短期性、可扩展性和兼容性不足等问题。一方面,后台数据库的建设,如数据

资源的采集、编目、录入等要全面系统,理清数据库各子库的关系及其内容的平衡性等,可以针对不同的文化资源子数据库,采取具体的项目驱动方式;另一方面,对于用户使用数据库而言,要做到用户友好和智能高效,让用户对数据库所包含的资源有清晰地了解,提高其检索利用的效率。

(三)做好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与开发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建设、开发与传承、创新是辩证统一的。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地区因多种原因,其文化环境、文化市场、文化设施、技术设备、文化服务理念等均较为落后。因此,在建设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过程中,要善于分析其文化影响力及其特有的文化竞争优势,学习和借鉴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建设的经验,把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与开发有效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曼.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研究[D].云南大学,2013.
- [2]刘淑萍.浅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数据库建设——以“畲族文化资源数据库”为例[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4,24:76-79.
- [3]何武,包羽.黔东南民族技术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与民族技术文化的保护[J].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02:24-31.
- [4]陈奇志.关于西部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01,05:30-32.
- [5]张旭,解虹.西域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中元数据选择与结构设计方案[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01:101-103.

责任编辑:马霞

民族团结教育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研究探析

程红瑜 石磊

【摘要】民族团结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举措,加强对多元文化社会中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有利于提高民族团结教育效果,促进国家整体国力的提升。本文从多元文化的不同角度阐述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影响,分析多元文化下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式,使其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

【关键词】民族团结 多元文化 教育

一、引言

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团结教育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使得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平等包容、和睦相处的关系。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任务。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各具特色的大环境下,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民族团结教育路径和方法,加强各民族人民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提高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在多元文化体系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能力。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民族团结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中华

民族不懈进步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目的。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靠的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合力共生的密切情感和强大的凝聚力。在多元一体文化社会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我们仍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和国内外复杂形势,必须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儿女大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凝聚力量。首先,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不断地沟通交流、合作融合,全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崛起及其发展模式引领的新型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并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增强各层次各方面的联系,对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有重要的作用,对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其次,民族团结教育能够加强各地区与国家间经济文

作者简介:程红瑜,女,本科,伊犁州社会主义学院理论研究室主任。

石磊,男,本科,伊犁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伊犁州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化互动交流,在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推进了各民族间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1]。最后,民族团结教育能够促进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通过形成民族团结共识、开展各种形式的团结合作,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相互学习、借鉴经验、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多元文化社会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影响

(一)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呈现出一体性和多元性特点,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团结的核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历史因素和传统习俗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这些都会对社会产生冲击,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的共识、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促进多元文化协调发展的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民族团结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华民族“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但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它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3]所谓“多元”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所谓“一体”是指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4]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诸族和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中

华文化始终是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包含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思想认识水平差异性以及传统习惯的差异性,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被淘汰。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样才能够使我国各族人民之间更加和谐友好相处,在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健康有序的高质量发展。

(三)当前民族团结教育的挑战

当前,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它涵盖了从科技创新、生产力进步到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转型,从思想理念交锋、经济利益矛盾再到地缘政治博弈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各领域,这些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障碍,同时伴随着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在日益密切的文化交流中这种差异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解,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文化特点、经济特点、民族特点、相对平衡的“多元文化”社会。而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如果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缺乏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方面就存在差距;民族地区发展的差距,会造成心理失衡,容易使部分社会成员对“多元文化”保持着一种隔阂和警惕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及时消除民族地区发展的差距、交往的障碍、情感的隔阂,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因此,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中要不断地创新与发展,要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推动各民族广泛交流、全面交流、深度融合恰逢其时。

四、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式

(一)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依据

民族团结教育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历史上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方面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认同,是对56个民族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的认同。”^[9]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在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中应注重培养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应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更加强调政治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

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外国经验和成果并与时俱进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且有效可行、适应国情特点且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符合我国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和国家意志特征的民族工作形式。民族团结教育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其实践模式主要是通过在学校、家庭、各类组织和社会中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互相帮助,彼此理解,共同发展的氛围,这种环境下培养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思想道德觉悟、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人才队伍。同时,民族团结教育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自身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应将个人的价值实现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体现自身的价值,从而促进个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应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建设,各级组织、学校、家庭和社会从多个层面都应发挥积极作用,不断提高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教育水平,促进民族团结教育深入基层、深入家庭、融入血脉,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社会传统和习惯。这些都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组织进行深入的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和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成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具体模式。

五、多元文化社会中民族团结教育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党的领导,提升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成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是具有远大战略目光和科学执政能力的政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因此,加强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才能凝聚民心,汇聚力量,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胜利。

(二)尊重文化多样性,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感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是民族和睦之魂。加强对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需要深入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和多元一体的本质,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明确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人心相通,根本在于价值观相通,文化理念相融。”^[9]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指民族团结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不仅要考虑各民族发展状况、经济水平、教育模式等方面因素,也要考虑单个民族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个体差异等因素。首先,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交流交往交融社会局

面,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才能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其次要加强对各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重要内容的了解与尊重,特别是引导各族群众正确区分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促进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帮助;最后,正确对待个体观点的独特差异。在教育中注重分辨和澄清模糊认识,最大程度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形成共识。在民族团结教育中要充分体现出这些特点,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措施,避免教育的模式化机械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才会更加凸显。

(三)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效果

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和方法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创新,才能够确保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可以借鉴国外的优秀教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断对教育的内容、方法、模式、途径进行创新,使民族团结教育更能体现时代性、民族性,更加满足当代国民的心理需求和生存需要。事实证明,民族团结教育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能够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在多元文化交流中,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互相学习和借鉴,这也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加强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文化教育、中华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科学技术教育、改革开放和先进理念教育,激发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加强各地区、各级各类组织间的交流合作,构建互通互学的教育实践模式,激发创新教育模式的活力;提供研究学习民族团结教育的途径,提升教育者的能力和水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各民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感受中华民族文化魅力,与伟大祖国同频共振。

(四)加强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文化融合

民族团结是国家进步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对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民族团结教育并不是把所有的民族都放在同一教育环境下,而是根据不同地

区民族文化特点,有所侧重地开展教育,并为各民族提供良好的交流与合作机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能够有力推动多元文化相互融合。民族团结教育是具有跨文化特点的教育活动,在教育引导中能够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应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中华文化本就是在多元一体的实践中发展的,民族团结本身也是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部分。因此,民族团结教育要建立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方特色文化结合起来,培养既能拥有中华民族凝聚力,又能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教育主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合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创新,鼓励各族群众通过传统节日活动开展互动交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民族团结教育的实施

目前,我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制度建设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不少空白。首先,建议加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法规建设,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制度支持。近年来,各地分别出台了一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比如,新疆率先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率先通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西藏、内蒙古、青海等省先后通过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条例,对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其次,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强化国民法治意识、法治思维。使各族人民认识到国家与个人之间和谐相处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具体体现,要强化国民民族团结意识,就要加强法制宣传工作,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内容进行深入阐述和广泛宣传,让各族人民了解加强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下转第70页)

关于政党协商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思考

定西市委统战部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种协商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团结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它最早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政党协商作为这一制度的重要运行机制,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大事,必相咨访”,也逐步由政治惯例上升为制度安排。

进入新时代,政党协商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日益凸显。2015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七种主要协商渠道,政党协商列首位。2015年10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2020年12月21日修订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2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对政党协商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基本实现了政党协商的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

近年来,定西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并认真组织政党协商,各民主党派组织积极参加政党协商,共同推动了政党协商工作的广泛开展,并且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些表现在实践层面,有些存在于制度本身。本文就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些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把“情况通报”作为政党协商特殊方式的认识问题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三条,《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政党协商的内容,同时《实施意见》还对政党协商的形式、程序和保障机制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在政党协商实践中,多数协商事项,特别是需要通过民主党派考察调研的协商事项基本上都能做到较充分地协商,但某些协商事项采取了由中共党委或有关职能部门通报情况的形式,此种形式是否能够完全体现协商应有的含义,是否符合我国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各方面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感受。有人从协商概念的原有含义出发,认为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进而认为“在理想的协商中,参与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平等的”,协商过程应该真实、充分,协商的目标就是“取得一致意见”。据此,他们认为政党协商也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协商事项经过充分交流,最终实现各方一致认可的结果。这些认识,总体看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全面。

第一,政党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协商主体的地位当然是平等的。中共作为执政党组织政党协商,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加政党协商,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实现政党合作。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领导者,但这种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它并没有否定“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并没有影响民主党派作为平等协商主体参加政党协商活动。

第二,政党协商既然采取协商形式,当然应该符合协商活动的一般要求,其协商过程必须真实、充分。政党协商是政治协商,它和市场活动中的经济协商或合同协商有着本质不同。政党协商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必须符合政治性原则,符合国家

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所以,政党协商过程中的真实、充分,是执政党真实反映情况,民主党派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并不是像经济协商或合同协商中的讨价还价。只要协商组织者真实地说明了情况,协商参加者充分地表达了意见,协商过程即告完成。至于政党协商中以情况通报的形式进行的协商事项,应该从制度上保证各民主党派有表达意见的特别环节和通道。

第三,政党协商的目标是参加协商的各方就协商事项达成共识。这里所谓“达成共识”应该有特定的含义,决不能与法律意义上的“意思表示一致”等概念相类比,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各方就协商事项形成共同认识的过程,即中共各级党委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对合理的意见建议给予采纳吸收,对不合理的意见建议给予解释说明。“达成共识”更多强调的是寻求共同认识的“过程”,而不是简单追求各方意见一致的“结果”。

从本质意义上讲,政党协商就是执政党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是参政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通过政党协商,一方面沟通了信息、说明了情况、消除了分歧、实现了凝心聚力;另一方面实现了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知情明政是多党合作的基本要求,而通报信息、说明情况、解释政策等,是知情明政的基本方式,当然这也是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多党合作的重要方式。如果通过“通报情况”很好地实现了“增进共识”的目标,很好地化解了矛盾,消除了分歧,凝聚了人心,那么政党协商的价值就已经很好地体现出来了。所以,中共作为政党协商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可以根据需要按照相关制度规定,规划和安排具体协商事项,选择适当的协商方式,如果某些特殊协商事项采取通报情况的方式,可以使政党协商更加具有实效性,那么这种方式就是适当的方式。当然,协商事项采取通报情况的方式,并没有因此使民主党派失去表达意见建议的机会,民主党派组织仍然可以就此协商事项向中共党委表达意见建议。

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政党协商中发表意见建议的对内效力问题

这里所谓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政党协商中发表意见建议的对内效力问题,指的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政党协商,表达的意见建议能否必然地代表该党派组织的意志,从而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根据《实施意见》的规定,政党协商有会议协商、约谈协商和书面协商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政党协商形式,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是协商活动的直接参加者。那么,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政党协商中表达意见建议,能否必然地代表党派意志,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需要区别情况并加以研究。

第一,民主党派成员层面。在政党协商中,民主党派负责人可以以党派的名义表达意见建议,也可以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意见建议。以党派的名义表达的意见建议,不一定必然地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而以个人名义表达的意见建议,又未必不能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无论是以何种名义表达的意见建议,如果要成为体现党派意志,代表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必须满足一定的程序性要求。根据各民主党派章程的规定,其组织活动基本上采取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但凡重大问题,都要由领导集体协商讨论,进行表决,作出决定。同时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组织”。政党协商事项属于“重大问题”,因此,能够反映党派组织意志,成为党派组织意见建议的,必须符合一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

第二,党派中央委员会层面。党派中央委员会是党派的最高领导机关,领导党派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本党派。所以,党派中央负责人在政党协商中以党派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意见建议,即为本党派的意见建议。由于党派中央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其在政党协商中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意见建议,亦为本党派的意见建议。这也就是说,党派中央负责人无论是以党派中央的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在政党协商中表达的意见建议,都必然地成为本党派的意见建议。当然,党派中央负责人声明其意见建议仅代表个人观点的除外。

第三,党派地方组织层面。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在政党协商中以党派组织的名义发表意见建议,不

能必然地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尽管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事实上是代表党派组织参加政党协商活动的。如果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的意见建议经过了必要的议事程序(一般是常务委员会通过),其意见建议即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如果该意见建议事前没有经过必要的议事程序,但事后以适当的方式报告党派组织,并得到认可,其意见建议亦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如果该意见建议事前没有经过必要的议事程序,事后也没有报告党派组织,该意见建议不能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声明其意见建议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该意见建议不能作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

我们强调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在政党协商中以党派组织的名义发表意见建议,不能像党派中央负责人表达的意见建议那样,必然地成为党派组织的意见建议,是因为党派地方组织不具备相应的政党地位,不具有独立的政党意志;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也不具有党派中央负责人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有权利,其以个人名义表达的意见建议,也仅是代表个人的意见建议。党派地方组织及其负责人履行职能、执行职务,必须服从党派中央和上级组织的领导,贯彻党派中央的工作部署,遵从党派的整体意志。

三、民主党派在政党协商中所提意见建议在采纳方面的特殊制度安排

在实践中,政党协商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委就协商事项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民主党派就协商事项提出意见建议的过程,政党协商的意义既体现在过程,更体现在结果。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同时通过具体制度对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分别作出规定。

第一,合理可行的意见建议,应该采纳吸收,并建立特别的保障落实机制。民主党派组织提出意见建议,如果反映了现实情况,既有合理性,也有可行性,中共党委和政府就应该及时采纳和吸收,并根据意见建议的内容予以落实。对民主党派合理可行的意见建议建立特别的保障落实机制,体现政党协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彰显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时代价值。

第二,不合理、不可行的意见建议,由有关部门作出回复和必要的说明。民主党派组织提出的意见建

议,如果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不能被采纳吸收或暂时不能被采纳吸收的,中共党委和政府不能作简单化处理,而应该由专门机构作出回复,并由相关部门作出情况说明,说明不能被采纳吸收或暂时不能被采纳吸收的理由。通过这种特殊的回复和情况说明的方式,体现政党协商所蕴含的平等、尊重等制度特点。

第三,认识尚有分歧的意见建议,应尽量采纳吸收。民主党派组织提出的意见建议与中共党委和政府的认识不尽一致,同时这种意见建议的合理性又不能马上作出明确判断的,中共党委和政府应当严肃对待,认真研究,尽量采纳吸收。特别是那些涉及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特定人群利益诉求的意见建议,要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的态度,在不违反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予以采纳吸收。这也是新时代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坚持“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这一重要原则的现实体现。

四、全面认识政党协商制度的多重价值

政治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党协商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形式,自然也体现出上述三种职能。但在现实中,政党协商往往更多关注凝聚智慧以及通过凝聚智慧进一步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方面,对增进共识重视不够,表现在具体协商工作中,更多关注民主党派提出意见建议的数量,以及意见建议被采纳的情况。有时,只把意见建议被采纳情况作为衡量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成绩以及政党协商是否具有实效性的唯一标准,完全忽视了协商过程本身的意义。准确理解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深刻内涵,全面认识政党协商制度的多重价值,是新时代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一,凝聚智慧是政党协商的基本要求。我国各民主党派精英荟萃,集中了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和优秀人才,通过政党协商把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智慧凝聚起来,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突出特点和显著优势,是新时代政党协商制度的基本要求。中共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政党协商积极组织者、有力促进者、自觉实践者的责任,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等方式,鼓励、支持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在履行政党协商职能中建真

言、献良策。各民主党派要担负起政党协商参加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努力提高协商建言的质量和水平。在具体协商活动中,各民主党派要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利用本党派特有人才资源,发挥本党派特殊界别优势,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各民主党派要注意发挥党派组织的整体优势,善于把党派成员的个体优势转化为党派整体优势,使党派成员的个体智慧汇聚成为更加系统化的党派集体智慧。总之,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把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方面智慧有效凝聚起来,是政党协商制度的基本价值。

第二,增进共识是政党协商的重要目的。政党协商是政治协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点,“增进共识”是一种政治要求,是政党协商制度所要实现的重要政治目的。因此,政党协商的“过程”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通过协商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中共各级党委要重视协商过程的组织工作,科学设计、合理安排协商程序,在协商过程中保证各民主党派能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意见建议。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一如既往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鼓励不同意见交流和讨

论,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氛围。”各民主党派要敢于表达意见建议,“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总之,政党协商的过程,就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过程,更是加强团结、增进共识的过程。

第三,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党协商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党协商,中共党委和政府对于协商事项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对协商事项的把握更细致、更准确。通过政党协商将有效促进党委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政党协商作为决策的必要环节,列入决策程序,认真组织、精心安排,使政党协商成为提高决策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方式;各民主党派要把政党协商作为履行职能的重点工作,积极参与,主动配合,通过参加政党协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用,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上接第66页)

掌握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约束能力,不断地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国民自觉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从思想深处强化民族团结意识。

结束语

民族团结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大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力度,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促进多元文化协调健康有序地开展,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繁荣发展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 [1]蔺君妍.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N].青岛日报,2023-12-19(01).
- [2]李道湘,铭松.中华文化与民族凝聚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9:51.
- [3]费孝通.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0.9:17.
- [4]费孝通.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0.9:17.
- [5]虎有泽,伊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7:201.
- [6]虎有泽,伊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240.

责任编辑:马霞

做好党外人才工作的对策建议

——以陇南市为例

陇南市委统战部

党外人才队伍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生力军,他们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陇南市为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目标,从全局的高度重视党外人才队伍建设,力求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造诣深、贡献大、结构优的党外人才队伍,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基本情况及现状特点

陇南市现有人口238.91万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1128人,党外知识分子6万余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8万余人,他们多数是科教文卫等传统领域和非公经济、社会中介组织和新媒体行业等方面的优秀代表和专家人才。全市党外人才的工作现状特点是:

一是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随着我国社会在一致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发展,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自主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科技文化知识较多的党外人才的心态也由单一趋向多样化,由封闭僵化逐渐转向开放活跃,其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信仰追求也更鲜明地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是社会思考日益理性。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的增强,党外人才更加关注现实、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大多数党外人才关心执政党的建设,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关心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关注社会热点,既对目前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所表现出的政治判断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总体方向。

三是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随着党外人才队伍的扩大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利益群体意识正在凸

显,社会功能不断强化,开始在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中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少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文化层次不断提高,社会联系面广,分析判断能力较强,对政治、法律、自然科学,有其独到见解,对参与社会管理、参政议政,反映行业的愿望热情很高,渴望担任人大、政协等更多的社会职务,愿意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

二、经验做法

(一)把凝聚思想共识作为党外人才工作的“根本点”。牢牢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政治方向,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全市统战工作的“纲”和“魂”,全市统战系统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始终把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摆在突出位置,坚定理想信念、夯实理论基础,同时,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组织市县(区)统战系统干部和统一战线成员通过多种形式持续学习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工作论述摘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等,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座谈会。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和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等贯穿到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以及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宗教界“党亲国好法大”教育实践活动等统一战线各类主题教育活动中,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筑牢全市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根基。

(二)把健全长效机制作为党外人才工作的“落脚点”。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加强与组织部门的沟通协作,与市委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和《党外干部选拔任用征求意见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党外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和条件,为做好新时代党外人才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的优势作用,市委统战部结合全市党外人才实际,创新开展了“千名党外乡土人才”培养工作,为全市党外乡土人才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提供了制度保障。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关于激励扶持陇南市优秀乡土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从10个方面提出30条激励扶持措施,帮助和引导优秀乡土人才发展优势产业,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加速。同时,注重发挥头雁效应,开展全市首批乡村振兴优秀乡土人才评选工作,树立榜样和旗帜。为办好《陇南议政建言》,凝聚党外发展合力,制定印发了《陇南市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办理落实反馈工作制度》,明确了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建立了意见建议的提出、梳理汇总、确认筛选、批转办理、督办落实、成果反馈等全链条工作机制。制定印发了《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三城五地”建设和“十大行动”重点任务完成情况民主监督的方案》,为切实有效开展民主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三)把搭建平台载体作为党外人才工作的“着力点”。立足陇南实际,创新建立了《陇南市党外人士建言献策工作落实协调机制》《陇南市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陇南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体制机制,为各领域党外优秀人才发挥作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着力提升党外人才能力素质,在市委党校和青岛社院举办全市党外代表人士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在井冈山市委党校举办全市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全面提升党外代表人士能力素质。联合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内对优秀贫困大学生和青年人才开展“送温暖、解难题”活动,召开优秀大学生和青年人才代表座谈会,号召和组织开展健康服务、志愿服务、民事直说、参观考察、我为家乡建言“五个一”活动,全市近6万名返乡大学生和青年人才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

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知联会和新联会建设,加强与周边市州和发达地区的沟通联系,先后邀请惠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来我市开展党史教育和考察交流活动、组织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赴云南省昆明市和四川省广元市、绵阳市考察学习,签订了《广元市、汉中市、陇南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合作发展协议书》。市知联会也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格局,与四川广元市和陕西汉中市知联会成立秦巴知联会专家联盟,为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党外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成立陇南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与广大留学人员的联系沟通,搭建留学人员联谊交流、服务发展、建言献策、奉献社会平台。

(四)把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党外人才工作的“关键点”。支持党外人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组织赴青岛、港澳开展了招商引资考察推介活动和“甘肃省青年企业家陇南行”“川渝企业陇南行”“浙商陇南行”等活动,全面助力陇南经济发展。持续推进“万企兴万村”陇南行动,261家企业与全市的375个村建立了结对关系,实施“兴村”项目375个,捐建公益项目294个,捐赠现金、物资共计9109.4万元,消费帮扶3695.14万元,培训技能人才3253人。40多家企业和商会组织结对全市农村84名孤儿和困难家庭,公益投入达40多万元。动员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助学活动,成县68户民营企业累计为成县教育振兴促进会捐款达4500万元;徽县20家民营企业捐款40余万元用于新校区建设。两当县通过“平台+学员+学校+销售”的模式,组织指导少数民族、留守妇女、残疾人学习制作销售艾制品、精美钩织工艺品,以实际行动营造扶弱助残的和谐社会新风尚。宕昌县通过“新阶层+公益”“统战部长担任爱心大使”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公益活动,受益人数3.2万余人,累计捐款捐物达512万元。充分发挥新联会和各实践创新基地的作用,配合市、县电商局(电商中心)建设电商直播村9个,直播基地20个,并组织培育网络达人,在全国蜂产业大会、兰洽会、花椒节等活动中开展直播带货。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实践创新基地积极开展免费电商技能培训,并优先招募有意愿从事电商事业的困难群体,灵活设置临时工、季节工等岗位,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上千人靠电商创业增收致富,全市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同时,针对各类优质的农特产品,积极拓展跨境电商销售渠道,仅2023年全市跨境电商销售额共计1724.36万元。

三、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一是认识仍有差距。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党外人才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没有真正把党外人才作为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把党外人才资源的开发、配置、管理工作真正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有的地区、部门,人才意识淡薄,用人观念陈旧,把培养选拔党外人才看成一种象征,是“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计”,是“政治需要”,不是“工作需要”,在党外人才的培养上舍不得下功夫、使用上不放心,工作上不主动,严重影响着党外人才工作的开展。

二是激励机制不够健全。从总体上看,党外人才工作协调机制、预测机制、激励保障机制、人才流动机制等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工作条块分割,管理不够科学,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合力。培养选拔缺乏总体规划,实际操作临时动议多,计划性不强。选拔人才视野不宽,没有充分挖掘党外人才中巨大的潜力,同时,习惯于把党外干部,与中共党员干部用一把尺子衡量,存在与党内人才的培养和锻炼机会不能均等、党外干部培养力度不够等问题。

三是队伍建设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在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的党外人才中,熟悉宏观经济、金融、法律等专业的不多,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中,了解国际国内市场,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运作,能够与先进地区接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的党外人才比较缺乏。

四、工作思路及意见建议

(一)提升党外人才工作认识。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全心全意做好培养、服务工作,做到使用好、留得住。作为统战工作部门,还要适应形势变化,创新工作方法,发挥统一战线的自身人才优势和组织网络优势,通过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和团体,联系和掌握各类人才,建立跨地区人才互通渠道,为本地引进更多更高层次的各类人才。

(二)创新党外人才工作的机制制度。一要建立

科学的培养教育机制。把党外人才队伍纳入党的整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体系,有计划有目标地安排参加各类学习培训,做到对党外人才政治培养与专业培养相结合,理论培养与能力培养相结合。二要建立科学的党外人才工作激励机制。建立党外人才库,实行滚动管理,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工作机制。对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重奖和宣传表彰,形成良好的激励竞争机制。三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拓展人才评价内涵,形成以业务知识、工作业绩、参政能力、群众基础等要素为标准的评价体系,真正使政治素质优、学识才智高、社会影响好、工作能力强、突出贡献大的党外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拓宽党外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渠道。我们要培养和选拔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管理人才,就要拓宽选人的视野,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面向社会广纳群贤。不仅要行政机选中选拔,还要在科教文卫等企事业单位选拔,特别要注重选拔一些熟悉市场经济、法律,擅长经营管理的党外人才。统战、组织部门要在研究党外人才的现状、特点和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把党外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纳入各个时期的人才建设总体规划。同时,适时采取挂职锻炼、轮岗交流、政治安排与实职安排交替进行,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四)营造重视党外人才的良好氛围。在选拔使用党外人才时,要打破传统的人才观,克服对党外人才的偏见,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党外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同时,牢固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强国”的观念,大力宣传党外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注、尊重党外人才的良好氛围。要对党外人才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党外人才的工作热情。要切实加强对党外人才工作的领导,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党政领导干部要与党外人才联系交友,搞好合作共事。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工作,不断开创党外人才工作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 参政党的新角色和新使命

天水市委统战部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参政党作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的新起点,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优秀传统品质,一百多年来,各民主党派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历史,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发展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相结合,注重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新时代参政党的使命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参政党的作用和使命也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参政党在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参政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参政党通过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监督政

府工作,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方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参政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参政党通过参与经济决策、推动创新发展、促进国际合作等方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参政党在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参政党通过关注民生问题、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及民主法制完善等方式,为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节奏,参政党的作用和使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参政党通过自身的建设和履职能力的提升,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更加积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参政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参政党的履职能力提升策略

新时代的十年伟大成就鼓舞人心,中共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催人奋进。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潮,参政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跟党走,积极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要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同时,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履职尽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升专业的协商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为国家和民

众服务的最优状态。

强化思想建设,筑牢政治忠诚。一是坚定政治立场。思想政治建设是参政党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在新的历史时期,参政党要坚定政治立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够更好地履行参政党的职责,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参政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重中之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要引导广大成员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三是加强思想引领。参政党要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广大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诚“两个确立”,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强化组织建设,完善党内民主。一是优化组织结构。优化组织结构是推进组织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随着参政党工作的多样化,参政党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组织机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界别成员特点进行合理设置,确保各个层级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要注重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组织架构,确保参政党始终保持高度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选人用人是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必须公正公平,要注重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政治素质。只有选贤任能,才能够确保干部队伍的质量和参政党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要注重对干部进行教育和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为参政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三是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推进组织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党内民

主是参政党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保持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要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增强参政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确保党内的每一个决策都能够得到广大参政党的支持和响应。同时,要注重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强化能力建设,提升履职本领。一是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是参政党的核心职责之一。参政议政工作是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方式。参政党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紧密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参政党还要注重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和协商,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二是加强调查与研究。加强调查与研究能力是参政党做好参政议政工作的基础。调查和研究是了解实际情况、把握问题本质的重要手段。参政党要深入基层,广泛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此外,参政党还要注重加强对国家政策的研究和理解,及时掌握政策动态和变化趋势,为参政议政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支持。三是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是参政党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体现。参政党不仅是政府的助手,更是人民的贴心人。要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参政党还要注重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合作,加强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沟通和交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四、从民盟自身角度看参政党的新角色和新使命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主党派之一,民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民盟形成了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影响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民盟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加强与中共的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下转第79页)

甘肃省对台经贸交流合作现状及对策建议

省委台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三抓三促”行动走深走深,省台办调研组按照统一调研部署,从4月初至6月底分别通过走市县、下基层、深入台资企业、现场调研、电话微信调研等多种方式对全省对台经济工作开展情况、台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惠台政策落实情况等进行了调研。总体看,我省对台经贸交流合作在中央、省委统一部署下,紧紧围绕践行“两岸一家亲”“促进心灵契合”“落实同等待遇”“推动融合发展”“打造共同市场”等政策主张,做了许多符合甘肃省情实际的工作,在推动陇台融合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台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后劲不足,台资企业总产值和陇台贸易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比较小,陇台经贸合作还处于低水平、低层次阶段的特点较为明显,未来发展挑战和机遇同在。

一、陇台经贸交流合作现状

(一)台资企业发展情况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登记注册台资企业332家,正常运营142家(大多为台资企业分公司、连锁机构或销售公司,包括统一、康师傅、旺旺、天福茗茶等销售机构和销售公司等),累计使用台资近8.3亿美元。陇台贸易自2017年以来连续维持在每年14

亿—17亿元人民币左右,2021年首次突破40亿元人民币,2022年受疫情影响又回落到30亿人民币。全省台资企业投资规模上亿元的不足5家,投资规模普遍较小,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种植、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加工销售、生物制药、机械制造、教育、化工、建材、电子、房地产等10余个行业,其中农业种植和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加工行业约占我省台资企业的比重为60%,生物制药、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电子、房地产、教育行业约占比为30%,服务业约占10%。目前较有影响和发展比较好的台资企业有康师傅兰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甘肃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甘肃正昌实业有限公司、甘肃东方种业有限公司、甘肃杰尼尔种子有限公司、甘肃华实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甘肃哥大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等,现有台资企业普遍科技含量较低,没有比较影响力的台商和台资龙头企业,台资企业产值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比较小。

(二)陇台经贸交流合作活动开展情况

近年来,我们依托“兰洽会”“药博会”等全省性经贸交流活动,邀请台湾岛内和海外台商团体、兄弟省市台资企业协会台商近50批次,1200多人次到我省考察参访,举办了“台商陇上行”“陇台中小企业合作恳谈会”“陇台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陇台高质量合作发展恳谈会”“陇台经贸合作交流会”等多项专题活动,组织台商考察了我省投资环境、相关产业园区,开展了项目推介、项目对接,实施了台资企业助力脱贫攻坚相关活动;组织实施、审批赴台经贸交流团组88个,620多人次入岛开展经贸交流、商务考察、技术合作;组织或协助组织有关市州台办、招商部门、产业园区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发达地区开展对台招商推介活动10余场次,推介招商项目60余个,达成合作意向20余项,参与活动台

胞台商超过500人次;组织在甘台商台企参加进博会、农博会,参加公祭伏羲大典、西王母文化论坛等国家和省内外重点活动,开展广泛经贸交流合作。特别是每年兰洽会,省上都给我办安排一项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从2012年起我们都将此项活动与“台商陇上行”活动紧密结合,每年根据活动内容确定不同的主题,目前已组织实施了十届,通过活动对宣传甘肃优势资源、项目和营商环境,促进陇台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惠台政策落实情况

中央惠台“31条”“26条”“11条”“农林22条”和我省“55条”实施意见发布后,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政策宣传和解读,多次组织台商和相关部门召开惠台政策培训解读会、座谈会,先后与13个省直部门沟通对接惠台政策落实任务,明确工作职责;会同省委统战部、省农业农村厅分别组成调研组赴11个市(州)县(区)、25家台资企业开展调研,召开工作座谈会,现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推动惠台政策落地落实,并形成《惠台政策在甘肃落实情况调研与思考》的调研报告,获国务院台办调研优秀课题和全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成果创新二等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按照中央、省委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精神,围绕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及时了解掌握台资企业因疫情造成的影响和复工复产存在的困难问题,指导台资企业细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向台资企业捐赠价值10余万元的口罩、酒精、手套等防疫物资,协调兰州海关解决东方种业原种进口问题,协助台资企业解决复工复产办证、用工等问题,按照“双循环”工作要求,帮助台资企业拓展产品内销市场,及时消解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力地支持了台资企业复工复产,由于工作措施得当,全省现有台资企业无一家因疫情关停,部分台资企业产销两旺,追加投资,经营发展超过预期。截至目前,中央发布的惠台政策有近20条在我省得到有效落实或部分落实,大多数台资企业普遍享受了税收优惠、出口退税、租金减免、社保缓缴、水电价优惠等惠台政策红利,台资企业获得感明显增强。

(四)维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情况

认真落实《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

则》和国务院台办有关做好涉台纠纷调处化解工作的通知精神,建立完善涉台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明确重大涉台纠纷列入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议题,重大涉台纠纷实行领导包抓、专人负责,建立了台胞权益保障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涉台纠纷处理法院联系点、法官工作室,聘请了涉台纠纷调处法律顾问,健全完善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纠纷调处工作机制。自2017年以来,我办共受理各类涉台信访纠纷38起,通过涉台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大部分涉台信访投诉纠纷案件得到及时解决,台胞和台资企业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特别是2019年,我们运用涉台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积极与省发改委、省税务局协调,召开联席会议,推动解决了兰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税收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问题,落实该企业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8000多万元,极大提振了企业投资经营信心,达到了安商稳商的效果。

(五)开展涉台捐赠服务协调工作情况

充分发挥与台胞台商和台湾岛内团体联系比较紧密的优势,紧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主动与台湾岛内慈善团体、各地台资企业协会和爱心台胞台商联系,积极引导他们参与我省脱贫攻坚,开展慈善捐助活动。自2017年以来,依托国台办帮扶广河县优势,主动向国台办汇报对接,协助国台办邀请台胞台商台资企业在广河县开展了扶贫车间、电商服务平台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修建蔬菜水果大棚、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拓展特色产品销路、开展捐资助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开展劳务输出和消费扶贫等助力脱贫攻坚活动,落实各类项目和捐助资金超过2000万元;积极与台湾慈济基金会联系,协助在我省开展了移民搬迁、援建中小学、冬令物资发放、资助贫困大学生等慈善捐助活动,落实各类捐助物资和资金4800余万元,实施完成了渭源县路园镇1200余万元移民搬迁项目和靖远县2100余万元小学和幼儿园建设项目,为白银、定西、临夏等地贫困群众发放了大批冬令物资,资助贫困大学生超过1000人次;积极与全国台企联、各地台资企业协会和康师傅、统一、旺旺、富邦金控等台资企业和爱心台胞联系,落实各类扶贫助学资金超过15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以来,通过各级台办协调联系落实各类涉台捐助资金达9700余万元,有力地

支持了我省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开展对台经贸交流合作面临的困难问题

(一)对台招商引资难度较大

调研发现,各地能够积极贯彻“请进来、走出去”工作思路,主动与台湾知名工商团体、各地台资企业协会接触交流,推介我省优势招商引资项目,邀请台商来我省开展商务考察,举办各种对台招商引资活动;组织有关经贸团体、民营企业赴台开展商务考察、经贸洽谈,但台资项目落地少,对台招商引资效果不明显。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展对台招商引资工作渠道单一、方法单一,缺乏创新和针对性;一些地方招商引资项目设计不精准,一味追求高、大、全,往往会使台商望而却步;台商普遍反映我省自然环境较差、交通运输不便、优惠政策与东南沿海没有差别、投资成本高、见效慢,对台商吸引力较差,台商投资意愿不强。

(二)台资企业分布不均衡,没有形成集聚发展效应

现有台资企业主要分布在省会兰州和河西走廊,黄河以东和黄河以南只有1家台商独资企业,其余均为像德克士、呷哺呷哺等台资连锁机构及康师傅、统一、旺旺等的销售机构。全省常住台胞台商比较少,台资企业发展大多单打独斗,也没有有影响力的台商和台资龙头企业示范带动,台资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较短,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台资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三)部分地方营商环境还有短板

近几年省上和有关市州都相继出台了許多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对政策吃不透、把不准的现象,一些政策措施往往停留在“纸面上”,主动服务意识还不够强,省上提倡的“保姆式”“一站式”服务还不到位;一些地方领导没有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对台经济工作,认为对台经济在地方经济总量中占比小、贡献少、分量轻,对对台经济工作还不够重视;有的地方招商部门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在引进台资中只注重签订意向投资协议,不注重跟进落实,有的地方在招商过程中乱许诺,引进台资后不兑现承诺;一些地方存在服务意识不强,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

(四)开展陇台经贸交流合作成效不明显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两岸关系形势影响,近年来陇台经贸交流活动无法在岛内开展,活动形式还比较单一,一般以邀请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为主,各省市内卷比较严重,邀请台商难度较大、针对性较差,陇台经贸交流活动主要以开展项目考察、实地感受甘肃发展变化、走访相关企业、举办宣传推介活动为主,开展活动的思路还不宽不广,目标任务不具体,项目对接不精准,大大影响了经贸交流活动成效。

三、工作思考及对策建议

(一)增强政治意识,稳慎有序开展陇台经贸工作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按照中央、省委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坚定历史自信,把牢陇台经贸工作政治方向,坚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先工作思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陇台经贸领域风险挑战,稳慎有序推动陇台经贸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全省中心工作任务,立足我省实际,鼓励引导台商台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支持台商台资企业参与我省“十四五”规划实施,支持台商台资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加强政策引导,扩大台资企业数量规模,助推台资企业向产业园区集中投资设厂,实现集聚发展、连片经营,尽快形成台资企业产业集群,有力服务全省中心工作。

(三)深化陇台经贸交流合作,加大对台招商引资力度

拓展工作渠道、拓宽工作思路,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工作力度,利用“兰洽会”“药博会”等平台优势,邀请台湾岛内工商团体、知名台商和各地台资企业协会来我省开展考察交流;加强与招商部门、产业园区合作,组织招商团队赴台资比较集中省份开展招商推介和项目洽谈活动;密切关注疫情和两岸关系形势变化,适时组织我省有关经济部门、工商团体、民营企业赴台开展商务考察和对接交流。按照“强链条、补短板”工作思路,重点吸引台资投资我省特色农业、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和互补性强的领域。

(四)着眼融合发展,落实同等待遇

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扎实推动中央“31条”“26条”“11条”“农林22条”等惠台措施和我省“55条实施意见”落实,确保台胞、台商、台资企业在我省投资、创业、就业、工作、生活方面普遍享受同等待遇。

(五)增强服务意识,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举措

持续深入宣传贯彻《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我省若干措施,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主动担当作为,主动靠前服务,推动落实“一站式”“保姆式”服务举措,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各类涉台投诉纠纷,切实增强台胞台商在我省投资的获得感、幸福感。

(六)加强联谊交友,广泛团结争取台湾民心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保持与台湾岛内友我工商团体、有影响力台商密切联系,加强与我省常住台胞台商联系,通过举办各类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慰问、联谊,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广泛团结争取台湾民心,让更多台胞

台商深切感悟和理解我捍卫祖国统一、推进民族复兴的坚定意志、坚强决心。

总体来看,甘肃作为欠发达省份,对台经贸工作还相对比较滞后,一些长期存在的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运输条件差、物流成本高等短板和干部思想观念陈旧、主动靠前服务意识淡薄、开拓进取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推动陇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影响较大,陇台经贸工作发展还任重道远。从近几年两岸贸易和台商投资情况来看,台商对大陆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和长期向好的经济趋势比较看好。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工作要求深入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和我省“强工业、强科技、强省会、强县域”工作部署稳步实施,陇台经贸合作将面临多重政策叠加机遇,未来在特色农业、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陇台合作发展的潜力较大。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上接第75页)

首先,民盟应继续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作为参政党,民盟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力,能够为国家决策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需要更加注重提高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紧密围绕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针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和未来的重大决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民盟通过与中共的合作,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再次,民盟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不断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质态。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为议政工作提供更加准确、更加全面的信息支持。二是提高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难点问题,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三是加强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沟通和交流。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

最后,民盟应积极拓展社会服务的功能。作为民主党派,民盟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力,可以发挥自身界别优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可以通过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守护天使工程”“金秋助学”“黄丝带”帮教“烛光行动”“希望工程·创客空间”等活动,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功能。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民盟与其他参政党的角色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格局中愈发显著。它们不仅构成中国政治生态的核心支柱,更在各自领域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活力和魅力。这种多元与和谐的共生关系,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和稳健性,也为我们的国家赋予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尽的创新潜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期待民盟与各参政党能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为中国的繁荣和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民盟天水市委员会 董仲奇 陈文军)

责任编辑:王昊

我省要持续拧紧电动自行车“安全阀” 赋能民生幸福

张玉燕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5亿辆,安全管理显得十分重要。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相比2022年上升了17.4%。我省高度重视电动自行车整治工作,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成效显著。但电动车入户充电、人车同屋、“飞线充电”等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尤其老旧小区问题较为严重,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警惕。

目前,我省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管理机制不畅通。存在相关职能部门责任边界不清,安全监管中存在相互推诿现象,出现执法盲区。

二、配套设施不完备。部分老旧小区未规划、设置户外集中充电桩或小区充电装置收费价格较高,造成入户充电、“飞线充电”。

三、设备维护不规范。存在违规改装或加装大容量蓄电池、大功率电机等行为;部分群众为节省费用选择非正规门店、非专业人士或者自己动手维修故障电动车,增加火灾风险。

四、消防设施覆盖弱。我省部分老旧小区、散住楼室内消防栓不完备不到位,容易导致电动车起火初期火势不可控,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有鉴于此,我省要持续拧紧电动自行车“安全阀”,赋能民生幸福。为此建议:

一、理顺工作机制,推动电动自行车的监管力度。要通过相应制度厘清部门具体职责,消除监管推

诿扯皮盲区,做到从严监管产品质量,及时清理隐患车辆,消除安全隐患;强化宣传教育,落实好“无牌无照、带篷打伞、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出门”的“四不出门”措施,时刻提醒群众牢记交通安全,并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切实减少事故发生;通过派发宣传单、面对面以案说法等形式,引导消费者养成到正规门店维修电动车辆的自觉消防安全意识。

二、完善配套设施,打造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环境。要科学有效合理规划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区,规范充电收费标准,打造安全的充电环境。对于不具备设置充电区的老旧小区通过除加强安全宣传等措施外,通过适当提供补贴等形式强制使用公牛等品牌电动自行车充电专用安全插座,使用负荷大的安全电线,有效杜绝安全隐患;争取在小区周边规划设置集中停放充电区或者将老旧小区电动车规划到周边大型小区解决安全充电问题。

三、解决维护漏洞,保证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维护。相关部门要追根溯源,严肃查处各种改装服务,追究改装者赔偿责任、刑事责任;优化智能号牌管理系统,确保违法电动自行车溯源查找,从而及时有效地管控维护漏洞,整治电动自行车的违规行为,规范电动自行车市场秩序,确保新入市电动车辆符合国家标准。

四、配齐消防设施,杜绝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加强巡查摸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配齐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有效控制意外事故风险系数。

责任编辑:王昊

作者简介:张玉燕,女,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侨联主席。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2024 年选题方向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秉持学术宗旨,提倡严谨治学,鼓励理论创新,关注实证研究,是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统一战线类内部刊物(季刊),设置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统一战线工作、中华文化、民族宗教等专题栏目。2024 年本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的“12 个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专题,结合甘肃统战工作,推出重点选题方向,诚邀省内外专家学者惠赐大作。

1.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研究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4.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
5.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6. 统一战线与“两个结合”
7. 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研究
8. 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规律研究
9. 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为甘肃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
10. 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
11.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研究
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5. 宗教中国化研究
16.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17. 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研究
18. 新时代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研究
19. 新时代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研究
20. 新时代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21. 新时代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作用研究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专家学者赐稿!

本刊联系方式如下:

编辑部电话:0931-7783804

学报投稿邮箱:gstzllyj@126.com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编辑部

